

JURNAL PENGAJIAN CINA MALAYSIA
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
JOURNAL OF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第二十五期

2020

Volume 25

目录 / Contents

一般论文 / Research Articles

- | | | |
|----------------|---|----|
| 蔡少谦 | 关于辜礼欢祖籍地“古宅说”的质疑与“白礁辜厝说”的考证 | 1 |
| CAI Shaoqian | Revisiting the Claims of “Guzhai Village” and “Baijiao Gucuo Village” as Koh Lay Hwan’s Ancestral Home with New Evidences | |
| 刘香兰 | 一个家族、五个世代：金门吴家在马来西亚百年征途的个案研究 | 15 |
| LIU Hsiang Lan | One Family and Five Generations: The Cas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Struggling Experiences of a Kinmen Wu Family in Malaysia for One Hundred Years | |
| 阮湧仰 | 马六甲华人甲必丹曾其禄与曾应葵生平事迹补遗 | 65 |
| YON Weng Woe | A Supplementary Note on Chan Ki Lock and Chan Jam Qua, the Two Chinese Kapitan of Malacca | |
| 张喜崇 | 马来西亚独中教师对于实体和线上教专课程满意度比较研究 | 91 |
| TEOH Hee Chong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alaysia Independent Chinese Schools Teachers’ Satisfaction with Physical and Online Teacher Training Courses | |

书评 / Book Review

- | | | |
|--------------|--------------------------------|-----|
| 刁晏斌 | 怎样把华语研究做大做强？——《马来西亚华语研究论集》阅读札记 | 111 |
| DIAO Yan Bin | | |

一般论文
Research Articles

一个家族、五个世代： 金门吴家在马来西亚百年征途 的个案研究

One Family and Five Generations:
The Cas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Struggling Experiences
of a Kinmen Wu Family in Malaysia for One Hundred Years

刘香兰
(LIU Hsiang Lan)

摘要

金门（Quemoy）是处于中国福建省和台湾间的岛屿。1945年前，她隶属中国福建省，岛上大部分男性随福建帮下南洋，进入东南亚国家的劳力产业链。冷战蔓延东亚，毛泽东与蒋介石引发的国共内战，金门成为热战点，开始长达五十多年戒严。已迁到马来西亚的金门人被迫落地生根成立家族事业。本研究运用单一个案的研究策略，以家庭生命历程理论，探索金门吴家在马来西亚的百年征途，发现随不同历史时期，吴家内分家交织家族企业的交棒，各代模式不同，现代治理不过是因应内忧外压的策略。贯穿百年的是以男性继承、光宗耀祖的家族主义，维持家业永续与家庭关系的平衡。

关键词：国际迁移、家庭生命历程理论、个案研究、华人家族事

业、金门学

Abstract

Quemoy (Kinmen) is an island between Taiwan (R.O.C) and Fujian Province (CHN). Before 1945, it was subordinated to China and a large of number of its male residents immigrated to Southeast Asia entering the labor markets to be migrant workers. After 1945, Quemoy was affiliated to R.O.C and became the battlefield between the warring Nationalists and Communists as well as the frontline between Cold War nations. After that Quemoy was under military martial law for 50 years. In that period, the Kinmen's migrant workers were forced to live in Malaysia and developed small family business for survive. This study applied a single case study basing on family life course theory to explore the struggling paths of a Quemoy Wu family in Malaysia for One hundred years. The important finding is that the intervening between succession of family businesses and dispersing of family depending on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 However, the unchanged rule of succession is male-centered and value of glorify and illuminate the ancestors are vital cultural mechanisms to balance the continue of family businesses with more complicated family relationship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amily life course theory, Oversea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Case study, Quemoy study

一、前言

迁移是人类的传统，自古，个人、族群、商贩与军队就在全球各地穿梭（蔡继光译2002：17）。民族国家兴起，人的流动、流量、动线日趋多元，受国家管制，遂有境内或境外之分。Nivalainen（2004）界定迁移是人口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地方，在全球化浪潮下，人的流动与移动，让地理边界愈来愈模糊。迁移不仅包括长距的迁徙（migration）与短距的移动（movement）（洪嘉瑜、银庆贞2008），Findlay, McCollum & Gayle（2015）区分迁移（migration）与流动（mobilities），迁移倾向从事件的角度，了解迁移造成的影响，流动在社会科学领域视为一种“movement driven”，不只是事件，是相依生命在时空上流动，是社会关系的改变。苏淑娟（2018：357）将“mobility”界定为移动能力，因

技术或经济条件让人（群体）一而再、再而三的流动。“移动之民”作为概念，强调华人（Chinese）迁移存在全球化脉络，因此，重新检视华人在不同历史时期迁移动机、模式与国族认同就相当重要（张琼慧、梁一萍2018：9）。

华人迁移要放在全球化脉络。早期华人向外迁移迫于政经因素，近年华人出洋较是个人积极、自愿性移动，迁移动机、目的、路线与策略今昔有别（张琼慧、梁一萍2018：9）。此外，华人迁移及尔后发展，需从文化群体角度思考，以大中华为文化大伞，迁移是国族延伸，存在大中华经济政治整合之意。Ong（1999：7, 41）指出孔夫子主义支撑跨国资本主义运作，海外华人的家族企业，分家促使家族企业突破一个国家的框架，成为跨国企业家族（宋丽红、李新春、张书军2012），体现华人跨国资本主义的运作，中华文化全球化具支撑力。

华人（Chinese）是一文化大伞，内存异质族群，在不同历史时期进入国际迁移轨径。1857年中国正式解除海禁，是移民与私人贸易成长的关键。在鸦片战争后，随全球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浪潮，中国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南洋经济发展，型塑东亚殖民体制，让中国南部沿海人民下南洋，福建帮与金门帮等，从厦门进到东南亚劳动体制。据统计，1869年到1933年从厦门到东南亚的人数有一千四百七十万（引自孔复礼2019：21-23），目标地包括马来西亚、文莱、印尼、新加坡与菲律宾等，1947年粗估有近三百万华工，来自福建省就占32%（引自Goh 2008），数量相当可观。

马来西亚因丰沛的自然资源及地理位置的优势，先后被荷兰、英国殖民，是英国前进中国的前线，吸纳闽粤地区华人有相当历史（孔复礼2020：148）。19世纪初华人在马来半岛多从事种植业，20世纪初转至橡胶与油棕，后发现锡矿，成为华商投资重点（林水椽2001：xx）。英国殖民时期，因工业化发展所需，垂涎马六甲锡矿、中国通商后的丝绸与茶叶（刘政宽2020），促进华工的引进。马来西亚独立建国时，华人就占总人口37%，在独厚马来人的政经体制下，压缩华人生存空间，华人人数骤降，2001年华人人数占全马人数的比例跌至24%，2010年维持在24.6%

(Lopez 2013: 324)。此外,1970年起实施新经济政策,进行产业转型,制造业和建筑业快速发展,1990年加速私有化,1961年到2010年,农业部门产值占GDP的比例从36%降至10%、工业部门增加20%、制造业也增加17%,服务业微增5%(Felker 2013: 113),其中华人制造业占有相当的地位。2010年推出“经济转型计划”(ETP),列出最有潜力、促进整体经济增长的12个重点项目,包括棕榈油种植、旅游业、金融服务及电子产品业等,引入外资,2015年制定“马来西亚航天蓝图2030”,全力发展航天器材维修(MRO)、制造、系统整合、工程设计服务及教育培训(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alaysia 2018),马来西亚透过一系列的经济计划,引发产业和社会全面转型。

马六甲是华人最早迁移之地,原本是个小渔村,却是马来王国发起地。自古是东西方货物的交换地,在葡萄牙殖民时,殖民统治者对华商暴敛、征高税,让华侨出走,华人数一直有限。荷兰统治者继续对华商施压剥削,垄断所有贸易(石沧金2013: 163)。英国殖民统治时期,1901年在马六甲华人有19,468人,较1817年1,006人,百年来华人数增加183%,1980年华人占该市镇人口的74.4%(石沧金2013: 48、164),在锡矿、建筑业和橡胶业相当影响力。在一系列经济政策下,加速都市化,2010年都市化速度是全马之冠,人口增加率是全国第二(Guan 2013: 253)。近年,马六甲被纳入中国一带一路的海上丝绸发展路线,她更是全球化下各国布局的中心。

金门、马六甲,在华人迁移时代串起双方关系,是国际经济与政治的产物。金门,自古隶属中国福建省,坐落在厦门与台湾岛间,岛民多来自中国闽南家族,以姓氏为自然村过着渔猎和耕作的生活,受限于地质与天气收成不易,各族男性以连锁性移民,沿厦门进入东南亚各国,马来西亚是主要国家。二战后,金门被迫归属中华民国,切断与中国的连带,自1949年古宁头战役,后1954年“九三炮战”到1958年“八二三炮战”,她在三次台海危机成为冷战战场,长达五十多年戒严,维持军事统治,支持台湾工业化。2002年恢复与中国往来,金门与中国存在难以分割血缘和文化渊源,在金门、台湾不平衡的发展,早形成金门特定意识与身分,2008

年金门与中国进行多边深度的交流，举办“世界金门日”活动串起全球金侨，动员金门集体意识朝向全球化发展。

百年金门、马六甲蜕变，从默默无闻的小岛、小村沦为东西交战、交会之地，承受战火摧残，经过重建和社会转型，走向现代化与自由化，成为国家与非国家地带。一个家庭如何经历两地的多变？家庭是连结微视个体、巨视制度的中介团体，家庭生命历程如何镶嵌于所处的政经脉络？以一个金门吴家在马来西亚百年奋斗史，呼应华人族裔企业研究需关注全球化脉络与政经结构（方伟晶、陆超明2013），填补既有学术地图的空白，尤其海外华人家族企业研究呈现管理学聚焦于治理、社会学关注家庭变迁产生的缝隙，并重现闽南家族是一种离散家族（dispersed family）（江柏炜2003）的面貌，家企是经济家族的一面，内部安排与结构需从家庭变迁的角度理解。华人文化和家族伦理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家庭演进和家业治理扮演的角色？以一个在马六甲奋斗百年的吴家，呈现家族经历五代的演变，交杂家企转型的轨径，贡献于马来西亚华人家庭与迁移研究。

二、理论与文献检阅

家庭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是家庭社会学研析所在，80年代后在台湾蓬勃发展，研究主题有三：1.家庭组织与结构，反映社会变迁；2.家庭关系，反映工业化或现代化产生的改变；3.妇女在家庭中角色与地位（伊庆春、吕玉瑕1996：170-171）。在社会学的世界，家庭有被动性、被影响的位置，也有影响力，家庭是展现巨视、微视层次的联结与交互作用之处（章英华1994；雷洁琼2000）。家庭生命历程理论既能从巨视层次掌握家庭与社会变迁的镶嵌，也能从微视层次分析家庭改变历程（刘香兰2019a），为本文主要视角。

（一）家庭生命历程理论：知识传统、假定、内涵

Glick（1947）是首位界定家庭生命周期的学者（杨利静、刘一龙

2002），Bengtson & Allen于1993年运用生命历程观点在家庭分析，到White & Klein（2002）出版*Family Theories*一书，专章介绍“家庭生命历程发展架构”（The Family Life Course Developmental Framework），¹ 后在再版精进理论建构。该理论受家庭发展理论、生命历程理论及个人生命全程理论（Individual life span theory）影响，² 强调家庭历程的多元和去阶段性，重视长期变迁及累积性影响，并将家庭发展作为家庭变迁的一种型态（马永年、梁婉华译2016：131）。

家庭生命历程理论主要五个内涵（如表1）：1.重视时间多重性与多面向，包括社会过程时间（关注社会规范的时间和其存在的社会过程、制度镶嵌性）、家庭时间（各世代在家庭事件的影响力与世代间权力的分配如何造成家庭变迁）和历史时间（历史阶段对家庭组成、结构的影响）；2.视家庭团体为半渗透单位，受制度与规范的期待与影响，家庭与社会事件的互动对制度也产生回馈；3.家庭的社会生态：处于特定社会结构与位置，有特定压力与机会，因阶级与族群有别；4.长期（diachronic）分析：关注过程、强调世代研究；5.家庭多样性：特定群体的家庭生命历程存在差异。简言之，家庭生命历程理论捕捉特定历史时期事件和家庭事件间的关联，家庭变迁轨迹、型态因族群和阶级形成多元化家庭生命历程（White & Klein 2008: 132-133）。

表1：家庭生命历程发展理论的假定与内涵

假定	主要内涵
1) 时间多重性与多面向	社会过程时间（social process time）、家庭时间与历史时间的关联。
2) 半渗透的单位（a semi-permeable unit）	家庭受制度规范、社会事件影响，并影响社会制度。
3) 家庭的社会生态	家庭在社会结构的位置存在机会与压力，因阶级与族群有别。重视亲友网络的功能与改变。

4) 长期 (diachronic) 分析	了解家庭变迁过程，尤其家庭转折与路径，关注累积性效应。注意年龄、时期（历史事件）与世代效应的互动。
5) 异质和多元	因年龄、族群和阶级有别的多元化家庭生命历程。

资料来源：参考刘香兰（2019a）。

（二）家庭生命历程的研究取径

强调长期分析与跨科际整合的方法是家庭生命历程研究的特色，世代为研究策略，家庭世代（Generation）指家庭是跨时间的单位，生出在相同时间的家庭成员是同代，不同代有不同的压力与机会，各代在家庭（族）有不同的位置（Elder & George 2016: 64），为此，对于家庭世代可进行多层次分析（Bengtson & Allen 1993）（表2）：1.微视层次，个别成员生命史与家庭史链接事件顺序与家庭阶段变迁、世代和亲友结构的转变，链接社会变迁（Pratt & Fiese 2004: 2-3, 16-17; White & Klein 2002）；2.中介层次，亲友网络扮演的角色与功能，透过世代分析掌握代内、跨代网络变迁；3.巨视层次，家庭作为一个制度，家庭存在的结构与特性受制度与跨制度的影响。研究取径包括能以量化研究，搜集长期资料，用次级资料方法和历史事件分析、顺序分析（sequence analysis），掌握整体家庭生命历程的变异、偏离，连结社会变迁（马永年、梁婉华译2016: 134），更进行跨世代与跨国比较。另也可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透过家庭史、生命史回溯和诠释，掌握历史重大事件、社会制度之融合性与家庭变迁的镶嵌性（Bengtson & Allen 1993）。

表2：家庭生命历程分析层次与研究取向

	结构层次	中介层次	微视层次
分析	家庭作为一个社会制度，模式与特性是受制度与跨制度影响	强调家庭角色与规范的建构和家庭团体内部的关系，及家庭如何引发社会变迁的过程	家庭成员个别生命事件、阶段变迁和生命历程轨迹与家庭事件、家庭变迁、社会事件与历史产生关连

研究视角	量化：运用历史事件分析、顺序分析等技巧，勾勒家庭长期变化，分析结构、轨迹、顺序的变异度 质化：生命史、家庭史连结历史与制度	生命史与家庭史：将家庭史连结个人与家人、世代和亲友结构的转变，采叙事分析法，连结家庭变化、社会变迁	
------	--	---	--

研究者自制。

（三）文献检阅：家庭迁移研究与海外华人家族事业研究

华人迁移背后存在家庭逻辑，早在华人迁移文献被强调。Maurice Freedman（1966）所著*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书中指出华人迁移具有世系和宗族特征，要放进全球化脉络。仅从管理或治理角度，易忽略华人家族事业是家庭生存的策略，尤其是事业发达与否攸关家庭荣辱（孔复礼2019：51）。家庭企业与家庭是一个整体，有助于了解海外金门家庭变迁与家族企业转型的连动性。

（1）家庭置于华人迁移研究

Ong（1999: 8-16）在*Flexible Citizenship*归纳三个研究国际迁移的取径：1.美国为中心的迁移研究（U.S.-centered migration studies）；2.文化全球化（cultural globalization）；3.离散（diasporas）和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s）。以美国为中心的迁移研究取径反映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观，文化全球化取径来自文化人类学，强调国际迁移存在跨界的文化生产与再生产，聚焦于文化逻辑如何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的运作；离散研究（diasporas）强调主体性经验与理解，世界主义强调西方菁英表达与发展的与殖民、资本主义相关的价值表现，迁移研究展现学术菁英的一种意图。从华人长期海外移动，连动中华文化的扩散，2019年有2.72亿人跨国迁移，占世界人口的3.5%，其中亚洲国际迁移人数占全球迁移40%

以上的事实（*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2020*），需以文化取径解释文化逻辑如何支撑海外金门家庭的奋斗历程。

文化全球化强调迁移存在文化与族群内涵。Ong（1999: 22-23）认为跨界者处于特定人、地方与全球的结构，透过特定的文化方式响应结构性压力。如华人文化强调忠、孝，成为一种语言与符号，伴随华人全球经济网络，在各国发展认同，支持华人经济体制，已成为世界竞争的新型态。孔复礼（2019: 9-10）描述华人五百年移民史，移民是家国的延伸，华人移民史和国族史是一个整体。因此，国际迁移存在不可忽视的族群意涵（Umut Erel & Nahaboo 2016）。

此外，迁移研究的焦点也从性别盲转向加入性别和家庭的视角。1960到1970年的迁移研究以男性为主，反映当时迁移者多是男性，并以就业为主，让迁移研究偏向于男性与公领域，家庭迁移被忽略（Kofman 2004; Raghuram 2004）。到1970年底，家庭的观点被带进迁移研究。Miner（1978）运用人力资本理论讨论家庭迁移，视迁移是家庭投资行为，也是家庭理性的决策（Nivalainen 2004），但仍以男性为主，忽略家庭成员因迁移产生的损失。1979后迁移研究探讨双薪家庭、夫妻迁移中对女性配偶产生的影响（Boyle & Feng 2009），女性因配合男性配偶的生涯，产生中断工作、无业，牺牲论述因而产生（Raghuram 2004），继而讨论女性生命历程与迁移的关系。1980年末，愈来愈多的人离乡背井在异国工作，家庭团聚成为移民政策的重点，促进家庭迁移研究，关注家庭支持和家庭网络（Boyd 1989）。家庭迁移是个人与社会的连结点，也是公私领域的交会处，交杂个人生命历程、家庭生命历程（Nauck & Settles 2001: 462; Nivalainen 2004），因家庭迁移本质与型态不断变动，难以产生类属（Kofman 2004），成为研究挑战。

简言之，个人迁移是家庭能量的延伸，家庭迁移与国家政策的制度性规范有关，迁移研究有家庭的思考，方能超越传统迁移研究存在的二元分类（dichotomy），包括长期vs.短期、国内与国际、经济目的与非经济目的、自发的vs.强迫的，并把这些二元分类整合为整体，突破迁移者是谁？是男性或女性？主要迁移者或依亲者？更不要说迁移研究牵涉到阶级、国

家和区域政治经济分类（黄佳媛、姜兰红、陈端容2012）。

综合以上，国际迁移研究已纳入家庭与文化幅度，并强调国家角色。如今，跨国家户（transnational household）成为一种生存与奋斗的类型，反映年龄、世代、时期与地方的特定连结（Findlay, McCollum & Gayle 2015），说明移动之民在全球网络中不断前进，家庭与国族力量得持续扩张，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制。

（2）台湾国际迁移研究：忽略金门与海外家庭长期变迁

台湾国际迁移的研究，呈现在特定时期、特定区域的发展轨道。1960年代起，因国外新移民法令的修订，台湾人经留学、工作及投资等管道，定居于美国、加拿大、澳洲等。1980年代台湾南向政策，台湾人前进东南亚发展（顾长永2006），1990年代起，纽澳开放移民，台湾人也跟进（宋郁玲2002）。两千年以后欧美经济衰退，中国和东南亚经济发展，吸引台湾人（尤其是年轻人）转向亚洲（顾长永2006），可见台湾人海外迁移动线深受国际政经之影响。

“台湾人到大陆”的结构性脉络，成为近年迁移研究焦点。有的关注台商与其家庭的生命经验（Lin 2013），有的关注台青到大陆工作与教育（吴伊凡、蓝佩嘉2012），曾熾芬（2012）指出台湾人到大陆呈现阶级化和年轻化的现象，是家族文化资本累积的计划，便于与世界接轨。由于到大陆工作和求学，在国家政策不支持下，凸显社会网络和家庭角色的关键（Tsai & Chang 2010）。

具有历史定位的金门，在不同历史时间隶属不同国家，迁移路径深受国家宰制。金门自古隶属中国福建省，金门人随福建帮经厦门往南洋，背后是殖民统治者的操作（萧新煌、张翰壁、张维安编2020：17）。冷战蔓延，金门变为中华民国一个离岛，国共内战爆发，蒋介石迁台，金门变为军事堡垒，国际迁移必经台湾，受到严控。到2002年小三通政策实施，国境管制松绑，金门蜕变为两岸跨界的快捷方式，因此，研究金门国际迁移需要理解历史脉络。

金门迁移素被纳入华人迁移研究，并在金门学范畴发展，有三个相关主题：1.海外金门的结社和会馆；2.侨领对金门社会与宗族的贡献；3.家族迁移的描述。这些研究时点多在1980年以前，充满男性个人主义或男性社群的集体记忆，如晚清金门山氏王后中堡个案研究（江柏炜2003），也有描述金门家族在不同国家的发展，如菲律宾（江柏炜2016a）、文莱烈屿家族（江柏炜2019），肯定金门迁移具家族意涵，但忽略将金门家庭迁移与国家、超越国家的脉络连结。

尤其闽南人在海上称帝的历史，均见宗族、乡团与结社在特定时代扮演的意义（汤锦台2013）。早期海外华人多以血缘、地缘为结社基础，来自同县、同乡与同方言形成凝聚力，组织秘密会社，或形成公司、帮、会馆，从地方层级，扩大到省级（福建、广东与广西）组织（如会馆）（古鸿廷1994），州、邦层级，又和产业性组织链接，形成交错的连结和网络，捍卫华人利益。自中国崛起，全球性宗亲组织（如特定姓氏宗亲会全球总会等）的形成，并随国际发展框架动态移位，更须把政治与经济作用带进宗亲和华人结社的变迁，以掌握相依生命的结构和功能的变化。

简言之，台湾国际迁移研究忽略离岛，金门做为一个闽南族群的国际迁移，多呈现落番时期的男性经验，忽略家庭，因此，把家庭带进金门迁移并连结巨视政治经济脉络，助于发现闽南家庭跨国迁移的样态。

（3）海外华人家族企业的研究：重管理，忽略家庭生命历程

华人在海外生存，受限教育、语言，移民第一代从苦力走向经商，是政治经济的产物。从小生意，发展中小规模的家庭事业，扩张为家族企业，多被归纳在管理学范畴，讨论家族企业界定（储小平2004）、海外华人家族事业的治理特色（李新春、檀宏斌2010）、结业与交棒（Bruton, Ahlstrom & Wan 2003）等议题，强调华人企业特有的文化逻辑与治理型态。华企研究自1960年网络分析和1980年经济社会学的出现后，焦点多放在华企内部结构与安排（方伟晶、陆超明2013），从西方管理学讨论文化和家族伦理在家企的矛盾与张力，忽略事业是家族的经济面向，是

难以分割的整体。仅有宋丽红、李新春与张书军（2018）认为海外华人企业的分家是一种家庭演进的过程，助于家业在异界扩张。方伟晶、陆超明（2013）提出华企组织型态须放在全球化脉络，加强经济全球化和华企组织变迁的链接，以呈现华企发展与内部安排是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共构的产物。

以马来西亚华人生意和家族企业的研究，首推2003年出版《马来西亚华人生意》，是第一部深度描述马来西亚华企如何受政治经济影响之作，其以1957年到1997年金融风暴前，呈现12个华企、华商的成功之道。Yue & Kean（2014）仅关注代间交棒与内部分权，李健友（2016）以马来西亚橡胶业为主，以公司创立于马来西亚建国后至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背景，透过11个家企，探索将第一代创立者的隐形智慧在交棒时转化成为企业创新的基础。这几篇代表作，展现马来西亚华商卓越的禀赋和强大韧性克服马来西亚族群政治的挑战，但缺少从马六甲发迹的金门家族的长期研究，呈现特定地理位置中金门家族在全球化下演进历程，如何因族群和阶级有不同的家庭变迁历程。

对金门人来说，离散并不减损家族与宗族完整性，海外金门家族的事业发展是经济家族的展现（江柏炜2003）。透视家庭生命历程中事业之变迁、探索在马六甲栖息的金门家庭百年变迁及家业历经五代的特定关系，反映原乡金门、侨居地在百年的多重变迁，是本文主要目的。为此，主要提问：1.冷战蔓延初期（1900年）金门家庭迁移到马来西亚马六甲，百年家庭生命历程样态？如何与主要特定历史阶段下制度脉络连结？2.在马六甲金门家族的事业演进经历那些历程？治理模式如何反映不同时期的内忧（家庭压力与冲突等）外压（政治经济政策的压力与要求）？3.家族主义与文化逻辑对海外金门家庭变迁与家业治理扮演的角色与意义？

三、研究典范、研究设计与过程

流动（mobilities）是相依的生命在时空上流动，涉及社会关系的改变（Friday et al. 2015），透过跨界者的声音，方能捕捉隐而不宣的生存智

慧。有别于量化研究典范，质性研究是以人为导向（Patton 1990: 32），基于建构理论之本体观，透过平等、合作关系，研究对象分享观点与感受，达到认识现象（Williams, Popay & Oakley 1999），采多元方法论和弹性的研究过程，呈现脉络深度，并兼具性别与文化多元性（Tyson 1992）的研究典范。

质性研究运用在家庭企业研究，更有特殊性。Fletcher, Massis and Nordqvist (2015)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s and family business scholarship: A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一文，解析多篇以质性研究运用在家企领域的文献，从研究议题、设计与资料分析讨论质性研究运用在家企领域的优点与限制。该文指出个案研究法应用在家企研究相当普遍，包括单一个案与多个案的研究设计（multiple case design），样本愈多可能难以深度、全面掌握每一个案的细节，尤其是长期和跨代的家企变迁，忽略捕捉家企存在双元性与矛盾，难发现隐而不宣的智慧。基于捕捉金门家庭在马来西亚的百年奋斗历程，从多层次分析呈现家庭变迁与政经结构的链接性，发现家族存续和家业永续的隐形智能，本研究采单一个案研究设计达掌握脉络全面性与深度的目标。

（一）单一个案研究（a case study）的方法学

单一个案研究基于建构理论（Stake 1995），深度扎根于脉络中各种现象（Miles & Huberman 1994）。就研究目的而言，单一个案研究设计需考虑能否回答how与why的问题，呈现脉络“厚度”，即脉络连结性与复杂性，达到全观理解（Yin 2003; Baxter & Jack 2008）。单一个案的分析单位，可能是个人、家庭、组织、小区或是国家，视研究目的而定。但为避免选样或决定分析单位的困扰，可透过时间与空间、时间与活动、脉络和定义来界定个案范围（Stake 1995; Yin 2003）。

单一个案研究法应用海外华人家族企业研究相当普遍，但倾向企业内部治理，如Tan & Fock（2001）、李新春与檀宏斌（2010）。以马来西亚华人生意和家族企业的研究，Yue & Kean（2014）强调（海外）华人企业的

治理，涉及代间交棒与内部分权，忽略家庭驱动力和移民社会对移民迫切性需要的讨论（吴元珍译2013），也忽略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变迁反映资本主义市场和政治压力的结果（王宏仁2001），并缺乏长期研究。近年研究亚洲百年华人企业者，只有李新春与檀宏斌（2010）以一个香港百年家族企业，讨论家企内部分权路径，可惜过于呈现企业存在的封闭性，忽略家企、家族和外在环境的连结。

本研究选样设计与策略是依据Stake（1995）和Yin（2003），依时间与空间、时间与活动、脉络和定义来界定个案与其范围（如表3）。1.在时间向度，金门家庭迁移以冷战蔓延东亚的1900年为始点，并以研究时点（2020年）为终点，经历马来西亚殖民时期、独立建国时期、实施一连串国家经济政策的时期，家业在百年并未在任何时点有歇业和结业的情况。2.空间面向，是以马六甲为主，因其在史上具重要战略地位，从16世纪起马六甲华人以闽南福建帮为主（孔复礼2020：89-90），1950年闽南帮多做树胶工厂、驳船、采石、卸货、木匠等工作，1980年西马60个市镇中，33个市镇华人人口超过该市镇一半，马六甲华人人数占该市镇约75%（石沧金2013：48、72）。中小规模华企在1970年前占有限公司的资本低于30%，到1990年增加至45.5%、2006年42.4%，其他年代维持35%上下，在制造业一拔头筹，并在服务业有显著成长（Gomex 2013: 88-89）。以马六甲为场域，有利于掌握地理与族群关系在经济政策下的交互作用。3.以家庭为主体，其事业单位为家庭经济的一部分，从家庭结构、家庭事件、家业范围和治理型态等为主题。

访谈对象的接触，自2019年8月起研究者透过学术网络，连结马六甲金门会馆与巴生市雪兰莪金门会馆，请会馆提供可能的访谈家庭，并于10月前往两地进行密集式访谈一周。后发现吴家符合选样条件，第一代于1903年到马六甲，至今超过百年，从小店、矿业、屋业承包与屋业开发、工程业到服务业，历经五代，为主要参与家庭。

表3：本研究单一个案研究的选择样向度

向度	时间	地点/空间	单位	活动/事件
内涵	始于冷战初期迁移经历马来西亚独立建国，至研究时家业续存的家庭	马六甲，16世纪起为闽南人主要迁移之地，经历多国殖民为国际商城，华人有相当影响力；2013年以后中国一带一路政策将其纳入主要丝绸通路	家庭与家庭企业，包括家庭阶段、家庭关系与变迁；企业沿革，视家业为家庭经济活动	婚姻、分家/继承、迁移、个人生涯（教育与留学）、家业发展史、家业治理的模式、华人社群组织的活动与变迁、与金门关系

作者自制。

（二）资料搜集策略：深入访谈和档案分析方法的结合

资料搜集是在2019年8月起到2020年10月，包括档案资料和访谈，访谈先是2019年10月一周密集性访谈，后同年11月第五代继承人参与金门举办寻根之旅，进行一次非正式对话。次年因疫情爆发，于7月进行在线访谈吴家亲友、五代继承人，直到10月为止。与吴家第四代访谈计5次、第五代2次（不包括参访旅店）、其他亲友2人各1次，每次约1.5小时。访谈前签订协议书，经过同意全程录音，地点多在办公室（包括在线访谈）。在马六甲数日多与吴家成员一起生活，如到市场观察华人市场、到宫山峰访查并品味苦力餐、参访吴家古厝和事业所在地、全家看球赛、观察旅店经营，尤其前往第五代筹设饭店过程和主观经验。第四代提供保存家族的信件、报刊（如金门日报）、书籍、照片，多元资料做为资料品质之检验。同时拜访金门会馆、宫山峯文物协会，搜集会馆功能及早期苦力工的资料。访谈方向包括家庭成员早期在马六甲的工作与生存经验？代间与代内家庭关系和运作模式？性别角色的分工？接手家庭事业的方式与过程？接班人如何面对不同的压力与机会？不同时期家业的内涵、规模？和如何与金门原乡保持连结？除访谈，搭配档案文件，包括正式出版的传记、书信和报导等。本文初稿经吴家代表讨论，澄清资料和文中的论点。

（三）资料分析的策略与过程

资料整理与分析是并进过程，分为不同阶段。首先是将受访者编码，Wu1表示是吴家家业创始人，Wu2是吴家第二代主要继承人，以此类推。其次，依据理论建构历史阶段。台湾与马来西亚，从二战后先后被列强殖民，在冷战蔓延下，马来西亚独立建国，台湾走向民主化，透过国家计划经济政策，促进工业化，但马来西亚族群政治某种程度影响政治民主的发展（戴万平、顾长永2001）。冷战结束和中国崛起，与中国多边互动与深度交往成为金门和马来西亚的重点。为此，将两地政经体制自1900年至今分三阶段（表4）：1.殖民时期（1900年至1949年），是冷战蔓延东亚，金门原属中国到为台湾统治。马来西亚先后受荷兰与英国殖民，到独立建国前；2.独立与工业化阶段（1949年至1990年），台湾与马来西亚实施计划经济，走向工业化。马来西亚实施新经济政策，产生对华人特定结构性压力，金门处于长期戒严，发展停滞，人口大量外移台湾（刘香兰2019）；³ 3.“东亚区域政治”（1990年至2018年），中国崛起，成为世界中心，金门和马来西亚纷纷与中国发展多边合作和互动，金门与马六甲也有新的地位。

表4：历史主要阶段：金门原乡与马来西亚侨居地

	金门：原乡	马六甲：侨居地
1900-1949年 “殖民时期”	日本殖民与国共内战， 金门原属中国，后由中 华民国管制	所需要劳动力来自中国福 建，华人在经济占优势
1949-1990年 “独立与工业化阶段”	金门战地政务戒严支持 台湾工业化	1957年独立 1970-1990年新经济政策
1990-2018年 “东亚区域政治”	1992年金门解严 2002年后成为两岸直接 的前线 与中国和世界多边交流	国家发展政策 东亚自由贸易区 2013年中国一带一路将马 六甲纳入海上丝绸的重要 转换站

作者自制。

资料整理是将录音文件转为逐字稿，进行开放性编码。编码立基于家庭生命历程理论强调多层次分析，将资料区分三个层次：1.结构层次：家庭结构如何受制度与跨制度的影响；2.互动层次：强调家庭角色与规范的建构、家庭团体内部和亲友网络的角色和影响；3.个人层次：家庭成员个别生命事件、阶段变迁和轨迹与家庭事件。资料分析过程，依照各历史时期经济政策与政治制度整理为结构性脉络，再将吴家事件分类（家庭、家企、华人社团）对应特定历史阶段，发展特定历史阶段下各概念与主题，最后整合三个历史时期下家庭型态、家业治理的模式、华人网络特征，链接全球化脉络，形成论述主轴。

表5：发展概念与主题的分析过程

	金门：原乡	马六甲：侨居地	吴家主要变迁
1900-1949年 殖民时期	日本殖民与内战 金门从隶属于中国 转变为台湾离岛	殖民时期 英国建构族群阶层 的政治经济系统	男性连锁性移民，后 举家迁移家业草创， 第一代个人主导
	吴家被迫离散与团聚：家业发展有备无患		
1949-1990年 独立与工业化 阶段：	金门战地政务戒严 台湾工业化	1957年独立 1970-1990年新经 济政策	异乡变原乡；持续离 散：第三代起前往澳 洲留学 家族事业扩张 事与钱分离的交棒模 式
	持续的跨国离散与生命历程的歧异：跨代接班危机 与化解秘方		
1990-2018年 东亚区域政治	1992年金门解严 2002年金门为两岸 互动的前哨	国家发展政策 马六甲为中国一带 一路的重要转运站	跨代接班团队 前进服务业 引进现代治理 华人文化资本与全球 网络
	家业重整支持家庭永续：现代治理缓解内忧外压		

作者自制。

如表5，在1900-1949年殖民时期，金门人迁往马六甲是该处殖民统治

者的劳动需要和金门政治动荡不安的推力，吴家从个人迁移变为家庭迁移，也存在日本殖民和冷战蔓延下战争的结果，家庭团聚让海外吴家奋斗无后顾之忧，家庭成员成为生产的生力军，降低成本，形成“从个人迁移到家庭迁移：家业发展有备无患”的主题。此与独立建国与发展工业化时期的主题“持续的跨国离散与生命历程的歧异：跨代接班的危机与化解秘方”、东亚区域政治时期的主题“家业重整支持家庭永续：现代治理缓解内忧外压”进行连结与对话，形成“一个家族、五个世代：吴家百年征途的历程”的主轴（图1），将家庭变迁与家业治理连结百年金门与马来西亚的多重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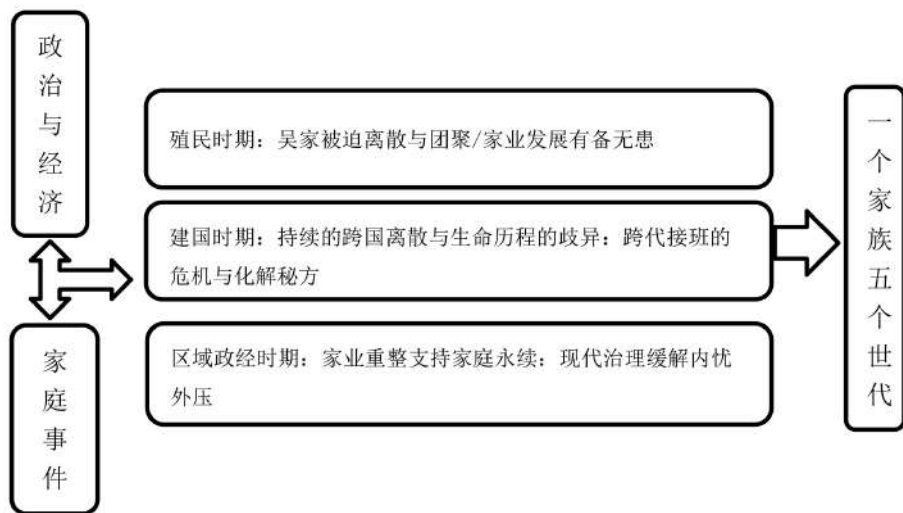


图1：从家庭事件连结政经脉络形成主题

四、两渔村、两种历史创伤：卷进热战的金门、 受列强争夺的马六甲

金门（Quemoy），旧称浯洲、浯江等名，由金门岛、烈屿（小金门）等岛组成，坐落于台湾海峡西侧、福建厦门湾外。1949年前金门属于中国福建省，随着16世纪东亚贸易网络形成，连结中国福建省、马来半岛

及中南半岛等地（汤锦台2013：162），开启华人移民的第一阶段（胡其瑜2018：30），金门是福建帮，透过连锁性移民网络向外迁移，是谓“侨乡金门时期”，这个历程金门人称为“落番”。“番”是指中国人自古瞧不起文化比自己低落的四周异族，称为东夷、南蛮、北狄、西戎，闽南人称东南亚土著为“番”。另一个说法是“番屏”，“屏”在闽南语是“边”的意思，到南洋便称为“落屏”（张姿惠2018：114-115）。当时进出国境不需任何手续，到南洋也无入境限制，从1882年到1932年，每年到马来半岛的华工在十万人以上（孔复礼2019：199）。金门迁移是沿同族同宗路径与目标，如珠山村薛氏前往吕宋、湖下杨氏前往新加坡、小金门人前往文莱，各宗族分道扬镳进入世界劳动体制。

冷战在东亚蔓延，金门成为冷战的热战点，跃上世界舞台。1949年后，金门成为台湾一个离岛，在蒋介石统治下实施长期50多年的军事戒严，被称为“军事战地政务时期”，阻碍金门与外界联系，社会发展停滞。直到1992年解严，2002年起成为两岸直通的中继站，开始与中国多面深度往来，进入全球化经济体系。近年举办全球性“世界金门日”象征金门集体意识和连结，突破两岸政治框架，图谋发展的企图。

马来西亚是闽南华人主要迁移地。马来半岛最早居民为Negrito和Senoi各族，原在沿海以采猎或在内陆密林耕种维生，有移民者后被迫迁往中央内陆山地。马来半岛位于东西贸易航道枢纽，自古便有印度、阿拉伯、中国商人在沿海进行商务活动（王国璋1997：20-21）。重商主义时代，先后被葡萄牙、荷兰、英国殖民，尤其在英国殖民时期，建构保障马来人和土著的政治体制，以利英国发展工业化，为汲取地方原料，所需大量人力由中国沿海地带的华人递补，华人多居住在人口密集的城镇或港口。英国殖民时期，产业多是外资企业，尤其是英国，到殖民后期，制造业以华人家族为主的中小企业为主（Gomez 2013：87）。1957年独立建国后，马来人在经济上的劣势成为社会压力，513族群暴动事件为实施20年新经济政策的引线（王国璋1997：147），建构马来人多利、华人让利的族群阶层。

新经济政策目标在建构国家整体的连结，消弥贫穷，透过保障与确认

行动措施，保障马来人经济优势与利益。在公部门部分，大量设置国营企业和公家机构，政府介入公部门的晋用与管理保障马来人就业。在私部门部分，规定工商业领域至少有30%马来人的参与治理和分享，马来人在特定产业的企业要有100%股权，否则华企没有资格进行政府标案。更成立马来人自营企业和银行，建构双元产业体制，让马来人在公、私部门遍地开花，增加与华企的竞争，将马来人置入华企组织，形成马来人掌握拥有权、华人掌握执行权的权力结构，改变华企体制（Gomez 2009）。新经济政策建构独尊马来人的族群阶层，国家资源在族群间透过部门、产业结构和组织分工进行整体再分配，华人和其他族群处于边缘和被剥削的位置，引发华人出走。

尽管新经济政策达到促进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降低绝对贫穷率、创造马来人向上流动的目标（Lee 2015: 169），但也种下更深族群内、族群间张力和长期国家发展的隐忧，包括图利少数马来人利益、形成新的政经垄断联盟（王国璋1997: 20-21）、加深区域不平等和财富所得分配不均等。从1970年到2008年华企在工业与制造业比例并未下降，更在服务业领域有显著成长，而马企成长比例停滞（Gomez 2013: 88），显出华企撑起马来西亚经济半边天，在逆境求胜的动能。2010年推出“经济转型计划”（ETP），列出最有潜力和能促进整体经济增长的12个全国重点经济领域，包括棕榈油种植、旅游业、金融服务及电子产品业等等，吸引外资。中国崛起，基于中国经济实力、中国是东亚武装武器主要供应者、华裔占马来西亚人口1/3种种条件，马来西亚以中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如今，马国在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已经离不开中国（Dhillon 2015: 382），华企华商顺势进入两国合作的网络核心，重构华人在马来西亚族群阶层的新地位。

马六甲位于马来半岛西岸，与西边印尼苏门答腊中隔马六甲海峡，北方是吉隆坡、往南是新加坡。自古，马六甲海域是重要国际海运通道，也是与中国最早建立关系的港口，天气稳定，有自然资源及世界最茂密的热带雨林，其天然橡胶、棕油、锡的出口举世无双，木材、天然气、石油及胡椒产量胜于东南亚各国，让她成为东西方商业交流之地。在殖民时期

更是西方列强抢夺之地。葡人与荷兰人先后统治马六甲，1795年从荷兰人取得统治权，维持马来政治既有的封建传统。到英国殖民统治后，为能供给工业化需要的原料和物产，进行马六甲空间重划，建置交通、通讯工程和基础建设，所需大量劳工，受限于当地农民自有土地难以动员，开始吸引华工与南印度工进入粗重与报酬较低的工作，而成为华工栖息地，进入锡矿与橡胶的开采，尔后更随殖民统治者的需要，进入制造业和建筑业。近年其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重地，又被中国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架构纳入中继站，带动文化与经济商机。2019年马六甲州吸引投资额8.79亿马币（约合2.15亿美元），其中国内投资额为6.1亿马币（占总投资额69.4%），外人直接投资额为2.69亿马币（占总投资额30.6%）。政府也计划性开发“马六甲海滨经济特区”（Melaka Waterfront Economic Zone，简称M-WEZ），将兴建自Umbai延伸至Tanjung Bruas 22公里的1万5,000英亩（6,070公顷）的填海土地，将其转变为独特国际投资与商业中心（经济部/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经济组2020）⁴，百年来，她永远是一个枢纽和要塞。

金门与马六甲两地因列强殖民侵略和冷战蔓延被卷进世界网络，改变无数人民与家庭的命运，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刻画在两地流动的吴家家庭史，成为特定族群家庭的集体记忆。

五、研究发现：一个家族、五个世代的吴家百年征途

出生在金门大地的吴家子弟，踏上“落番”脚步。1903年，吴家子弟三人一起下南洋，Wu1是16岁。离开金门，先后到泰国、新加坡做苦力，再到马来西亚麻坡，定于马六甲峯山宫，与金门乡亲一起做苦力，至今已超过百年。百年间重要转折与金门、马六甲的多重变迁镶嵌（表6），具体反映在家族事业的变革（表7）。从一开始三人行，只是苦力工，后成为资本家与企业家、华商网络的领导。第一代没受过教育，从其三代起留洋，多有硕士学位，到2019年家族有60%在海外定居，家族成员上百人。吴家家业规模从1950年代数百元马币到2008年已达近亿马币，员工也从纯

以华工为主转向跨族群的结构，一个家族五个世代，如何走过风雨飘摇马六甲和金门的百年？以下透过史时间序列勾勒吴家特定阶段的生命历程样态。

表6：金门原乡与马来西亚侨居地主要历史阶段

	金门：原乡	马六甲：侨居地	吴家主要变迁
1900-1949年 “殖民时期”	日本殖民与国内内战	马六甲为闽南人迁移主要目标	数人先行迁移，后举家迁移，发展石业
1949-1990年 “独立与工业化阶段”	金门战地政务戒严 台湾工业化	1957年独立 1970-1990年新经济策，发展工业化与族群政治体制 华人出走潮	家族事业扩张，涵盖木材、建筑和工程，第二代接棒 吴家子代前往澳洲念书、工作定居
1990-2018年 “东亚区域政治”	1992年金门解严 2002年小三通政策后成为两岸来往的前线 举办世界金门日和金侨后代寻根之旅等	国家加强私有化政策 马六甲加速都市化 成为中国一带一路的经济计划重要港口 新的国际投资与商业中心	跨接班团队： 建立治理体制，增进与原乡互动 第五代从澳洲留学后返回，进入家族事业

作者自制。

表7：吴家家族事业的百年变迁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事业内容与版图	屋业承包、开发和石矿	屋业开发、工程承包和石矿	屋业开发和石矿	地产管理、石矿和收租	地产管理、石矿和收租，渐进旅游业
经费规模	1950年代 数百元马币 1-2分/日薪	1970年代 数千马币 未滿一元/日薪	1990年代 百万马币 2-3元/日薪；180元/月薪	2002年代 千万马币 40元/日薪	2018年代 近亿马币

家庭持有股份比例	100%	100%	40%、30%、30%	保持3份股权，各家族各自有控股，并只能委任一位董事，永远保持3个董事为家族效劳	未知
家庭成员参与管理的人数	2	2	3	5	6
员工背景	福建金门为主	福建华工为主	华人为主	跨族群	跨族群
继承者教育（专业）与学历	无	无 自学	英国毕业（硕士）	英国毕业，澳大利亚毕业（硕士）	英国毕业，澳大利亚毕业（硕士）
继承者其他工作经验	码头工人	承包经营管理经营	无（读完书回公司任职）	无（读完书回公司任职）	无（读完书回公司任职）

作者自制。资料来源：Wu4。

（一）殖民时期：吴家被迫离散并在异乡团聚落地扎根

（1）原乡金门、异乡马六甲在殖民统治时期下的政经脉络

金门一直是移出社会，16世纪中叶后金门海外移民已见于地方史料，1860年后移出量达高峰，在1915年到1929年，金门人口少41%（江柏炜2016b），日本殖民金门短短八年（1935-1945），种下国族仇恨，金门人又逃难到南洋（欧阳仪雄2019）。金门岛在男性出洋后，成为留守妇孺岛（刘香兰2019b），散布在各国的金桥透过汇兑，协助乡里发展和改善家庭生活。直到1946年国共内战，金门成为台海防线，50多年的军事戒严，岛上居民依赖非正式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停滞。

马六甲从1795年受英国殖民，到马来西亚联邦成立，计166年之久（林若云2001：28）。为巩固殖民政权，英国承认马来人为当地土著，维

护其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特权，建构族群政治体制。二战间，日军占领新加坡，侵入马来西亚达三年八个月，二战结束后，她重回英国殖民，1948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透过多元族群政治的联盟，马来人特权在马来亚联合邦宪法受到保障（陈立圆2020），在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在经历不同帝国殖民下，不仅是多元族群的社会，更是以马来人为首的族群阶层社会。

马六甲是金门人主要栖息地，因英国占领马六甲需要大量劳力开垦，为招募中国南方劳工，透过香港洋行、船务公司、买办提供优渥酬劳派遣珠仔贩子深入广州、汕头、厦门附近乡镇活动。当时华工劳动迁移管道有三：1.客头带领结伙出洋；2.自愿自费，自行前往，在他国亲友接应；3.透过卖猪仔当契约工（李业霖2001：112）。在马六甲华人与富商居住于城镇，因勤奋迅速取代马来人，为英国开采锡矿，引起华工采锡热潮，促使矿业蓬勃发展，橡胶业也是透过华工发展，有的华人在累积资本后转而从商（王国璋1997：24-25），扮演中间买办者，华人群体的角色和地位日渐区别。

殖民时期进入马来半岛的华人，因地方和血缘的纽带在马六甲各自群结成公司或帮，金门人秉持闽南文化传统，宗亲辈分的家族伦理、以姓氏标示群体、建造族姓祠堂和祭拜祖先精神中心（苏黎明2018），区分华人群体，也有秘密会社，画地自限，因矿地利益冲突争斗，在英国殖民体制管制帮派械斗（王国璋1997：42），以宗亲会和会馆为台面上组织，当时已有某一方言群体占据主导地位的事实，方言群体领导透过掌握华人社会和提供所需服务取得权力（孔复礼2019：112、216），累积华人社群的社会资本，后在族群政治下，华人社团开始不分你我，走向连结与团结，维护华人集体利益。

（2）吴家被迫离散与团聚：家业发展与扩张

大地村（原名大治），是一单姓村落，因缺屏障挡御强风，收成不易，村人开始出走，1903年，年仅16岁的Wu1与兄弟经厦门，先到泰国，

大哥不堪操劳病逝，后因薪资微薄，Wu1与弟弟转往新加坡，做几年苦力，没发展机会，后听闻金门人在马来西亚发展不错，便前往马来西亚麻坡，先在石头工厂当石工，无法脱离3D工作，再转向马六甲。

英国殖民统治者为极大化对地方资源的汲取，改变马六甲空间，让主要命脉的平原街道更为开放，建设道路、设置通讯电话，聚落分布也从沿海延伸到内陆。苦力街位于垂直街道系统，靠近沿岸，是中低下阶层聚集处，也是相当拥挤的杂乱住宅单位，周边衍生相关的民生小店（刘政宽2020）。Wu1与弟弟便待在估俚间（意旨苦力集聚之地）栖身。估俚间位于马六甲老街峯山宫内（供奉福建安溪清水师与关公等），以单身男性为主华工，曾多达百位，吃喝住在一起，打架闹事，争夺工作，常有之事，内有苦力中介公司，1947年估俚间正式注册为码头工友联合会，集结华力（张姿慧2018：124-127），此不仅是支持体系，更是有效率的人力聘雇交流中心。吴家兄弟被安排在码头做搬运工，7月到年底是旺季，搬运外国商船输入中国杂货、泰国饲料、印度盐和西欧肥盐，淡季时他们自行承接散工，如做水泥等，增加收入。

几年后，兄弟存了钱，为脱离苦工身分，Wu1曾待过工地，认识同业，对建筑有兴趣，便在马六甲开一家专售五金、铁钉与木材买卖的小店，取名“金泉成”。其弟往船运发展，两人各有生涯。在建材行生意有起色，又盖木板厂，盖板屋当仓库，将仓库二楼供工人和亲友住，成为金门人接济所，除提供工作外，更帮忙将金门妻儿迁往团聚，让Wu1备受敬重，形成金门帮（张姿慧2018：122）。

因金门多是花岗岩，Wu1是在花岗石环境长大，又曾在麻坡当打石工，对石头建材略有了解，尝试买小山开采花岗石，转做石业生意，是事业转折点。正逢英国殖民政府要在马六甲进行填海工程，石材需依赖进口费工、费时，吴家石山成为独占者：

自己是厂商，他们自己是厂商，他们有工法，这是最重要的东西，他们就有那个材料，更何况那个时候没有竞争。

Wu1掌握生产工具与方法,运用福建帮的人力资源,建立“山王”事业。又与福建人结成拜把兄弟,延揽更大公共工程(如马六甲地标性建筑,包括国泰大桥、国际桥等),事业规模扩大。当拜把兄弟过世,Wu1照顾其妻小,展现华人特有的道义和义气(张姿慧2018:136)。后因无暇兼顾板厂生意,将板厂卖给同乡,将“金泉成”改为“金泉发”。石矿工程曾组织百来位华工,多半是金门同乡,可见他企业已达相当规模。Wu1又与同乡一起建造与销售,在房地产业有所展获,购置不少土地,事业如日中天,走向多元。吴家从五金行到石矿、建筑业、房地场和承揽公共工程,运用血缘、地缘关系纽带,成为社群领袖,事业集中在矿业、建筑业和工程界,有土地、资本、生产方法与材料、工人,自成吴家一条龙的经济体系。

江柏炜(2016b)指出早期出洋的金侨抱持衣锦还乡,依循金门传统,嫁娶以金门人为主。Wu1在1917年事业有成,返乡探亲娶亲。次年生下长子Wu2,1921年带妻小与弟弟迁移马六甲,1937年日本占领金门,Wu1更将金门亲族迁往,观望家乡情势。他与妻子共育6子女(2个儿子,4个女儿)。后在马六甲另娶二房,生下3子4女,加上收养4个儿子,共计17名子女。在金门进入战地政务军管时期,海外金侨与金门原乡互动受阻,迫使吴家在异乡落地生根。

马六甲华工因做苦力和压迫,出现群体抽鸦片之习,让其素有勤俭勤奋、储蓄侨汇形象和败家、不理性刻板印象并存,如何解释华工群体存在的矛盾?吴元珍译(2013)《血汗与麻将:一个海外华人小区的家庭与企业》一书诠释在印度的华人既有道德勤俭持家、累积资本的道德,也与各种赌博活动并存,赌,受到印度当地的谴责,但在华人社群难以抑制的理由主要是赌和命运连结,赌的意涵不仅是输赢,也是社交、刺激、命运和手气等,海外华人际遇本身是一个赌注。

早期华人在不同国家抽鸦片,存在特定历史条件。国家法律是否禁止是先决条件,殖民统治者可能禁制本国人抽,而对华工采开放、引诱,满足单身男性缺乏家庭支持、亲密关系、压力所需,更可能存在集团操控,残害华人身体和财产,更藉此污名化华人群体形象,是另一种宰制关系

（颜清煌1991）。Wu1抽鸦片成瘾后，影响事业，于1905年病逝。生前立遗嘱规定石山交由长子，其他儿子继承现金，以他名义的不动产皆不能转售，4个养子在马国法律不被视为继承人，画下继承界线：

以前，领养孩子越多代表他的...越有声望，越有财富，才可以领养嘛，然后这些是他领养的啊，他有照顾啊，全部都有啊，但是他在遗嘱把他的财产没有放领养的名字，对啊！

承袭金门传统，土地与房子是家族象征，不得擅自买卖，继承以男性子嗣为主（林金荣2009）。从家族企业的定义，Wu1的事业符合家庭成员在自己成立的企业中拥有相当的财力与权力的内涵（储小平2004），呈现华企诸多特征，如强调社会关系网络、孔夫子的动力逻辑（Confucian dynamism），将乡亲纳入准家庭关系，又强调家族主义的角色，以忠义伦常、五伦为关系网络的核心，并与权威家长式领袖有相当的个人连结（郑伯勋1995）。

华人家企的继承有三种模式：1是财产均分给儿子，即诸子均分，是传统模式，较易因利益纷争让家族企业解体或受到负面影响；2事业与金钱的分开继承，由一子继承家族企业，其他儿子继承等额的财富，不会造成事业日后多头马车；3将资金投资在不同事业体，分配给不同儿子掌管，演变成家族事业集团化，第2有利于其他继承者独立投资特定事业，第3种继承模式是透过将家业分配到不同继承者，在继承的产业互补原则下，极大化家族企业的规模（王宏仁2001）。在Wu1所立的继承模式，采第2种，运用家长权威摆平交棒的风险。

第一代交棒，沿袭闽南家族主义的传统，由长子继承事业、其他子嗣继承财富，是长期计划性差别对待的结果。Wu2于1918年在金门出生，3岁跟着父亲到马六甲，小学毕业后就跟着父亲学做生意，在家中补习英文、建筑、工程与设计。19岁时，Wu1成立“Wu2有限公司”由第二代独立自营。此以“长子独尊”的继承模式，建构继承者长期学习家业的特权，透过先成立以子为名的小公司，锻炼独立经营的经验，稳定后再将公司更改为父子之名，是种合并，从分支到合并，以父子关系为主的轴线。

海外华人社会的组织型态，以宗族和氏族网络为核心，在官府力未及之处，靠亲族合作自保维生。海外血缘性结社更是抵御在地势力的唯一防线，重要性更甚于在中国内地（吴燕和1885）。华人血缘性社团在新马地区早期占优势，1900年在马六甲就有江夏堂黄氏宗祠（石沧金2013：52）。华工进入马来西亚后，华社担负劳动力转介、纾困和情绪支持、发展在地华人教育和经济的功能。如Wu1兄弟进入低阶劳动力的华工网络，为被协助的个体，适应环境后自营小店，事业有雏型后，自组华工网络，第一代雇用百位乡亲，担起照顾责任，降低生产成本，兼顾华力的组织与培养，将华工纳进吴家一条龙的生产体制。他的事业为独占者、他的工程成为华人品牌、他的族裔企业凝聚福建帮与金门帮，吸引源源不绝的华人跨国迁移，助于华人社群的社会资本的累积。Wu2协助将乡亲组织转为合法组织，先后担任马六甲金门会馆主席、马六甲建筑商公会主席等荣誉职，取得乡团与业团的代表性地位，对外与政府协商，对内调节纷争，多行公益。至此，吴家势力已从家族、乡族社群扩大到产业领域、公领域。

1939年Wu1为Wu2结婚的贺礼，盖洋楼作为新居，家庭与家业重此整合在一栋洋楼，外型以龟造型设计，象征长寿，有家族永续之意（张姿慧2018：150-151）。吴家延续家乡传统，严守婚嫁及男女有别的性别角色。Wu1规定“必娶金门女人”，在Wu2未满20岁，安排回金娶妻，后生3男2女，吴家30多人一起生活，女性不得上桌吃饭，承担所有再生产劳动，扮演两种角色，一是无酬劳动，降低家业成本，培养健康与有能力的家庭成员；二是传承金门文化，逢年过节婚丧喜庆，负责蒸年糕、绑肉粽、做红龟糕，也做金门服饰，传递家乡味。家乡文化的再制加强金门帮意识与认同。此时与侨乡金门的连结主因Wu1母亲不愿迁往马六甲，Wu1在1929年兴建吴宅，改善母亲与家人的生活（张姿慧2018：36），也呼应1930年代前后，事业有成的金侨在金门老家盖洋楼与盖古厝，象征光宗耀祖，做为日后落叶归根的准备（江柏炜2016）。

（二）独立与工业化阶段（1950–1990）：回金无望，马国族群政经的压迫，吴家子弟持续跨国分散

（1）政权独立、工业化发展的政经脉络

二战结束，帝国主义退潮，中华民国自蒋介石撤台后成立，金门变为冷战边界，进入多年戒严军管时期，人人皆兵，社会发展处于停滞（宋怡明2016），金门人多迁到台湾，留在金门的家庭依赖军事经济，受到严控，海外金门宗亲只能以复杂低调方式与金门往来（黄子娟编2017），在马六甲的吴家被迫落地生根，偶尔绕远路经台湾回金门探望。

华人刻苦耐劳，在全球各地掌握相当经济实力，引起排华运动，无须赘述。在马来西亚，华人经济成就早引起不满，1940年起华人推行华语运动，成功塑造华人认同（萧新煌、张翰壁、张维安2020：117），加速积累族群间张力。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独立大学的设置引爆多年压力，随着1969年大选操作族群分裂及选后的政治重组，爆发513事件，造成华人死伤与财产损失，截至6月30日华人死亡143人，从此压缩华人在政治的可能（王国璋1997：108），促使1970年实施“新经济政策”，根本扭转马来人在经济的劣势（Zin 2013: 31；王国璋1997：147）。

在Gomez & Saravanamuttu（2013）编*The New Economic Policy in Malaysia*（2013）以政策评估的角度剖析实施20年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作为国家强力介入市场，企图建构国家连结为目的，消除绝对贫穷为目标，透过各种方案与计划为手段，建立不同规模的马来人企业、扶植特定国营事业促进经济发展，也进行公私部门人力替代，保障马来人在公、私部门就业率，培养马来人企业（家）、确保马来人在各产业占有相当比例管理与领导地位。新经济政策的成效，确实带来经济成长、降低马来人绝对贫穷率（1970年全体贫穷率为42.3%，1990年降至16.1%）、马来人在公部门就业比例大增、在私部门公司股权的占有率增加（20年来土著的成长约28%、其他马来人约6%，外国人降低30.3%）（引自王国璋1997：148），马来人中产阶级形成。尤其自1960年起将中小企业纳入工业化发展架构，迫使原本治理结构松散的华企改变治理型态（李健友2016），

1980年后更密集性知识为基础的工业化，华企面临相当生存压力。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非预期结果种下社会失衡发展。如公部门效率不彰的治理问题，不同规模的马企发展欲振乏力，不如预期（Gomez 2013: 90-91），存在高成本、低生产和依赖外资的马企体制，加深族群、城乡不平等、马来人内部分裂，建构公部门以马来人独大、华企在私部门的区隔（Lee 2013: 228），加速巫统有关既得利益者的阶级联盟。简言之，新经济政策虽达到灭贫之效，换得失衡的社会发展。

在新经济政策下吴家的压力是相当特定。“其将政府工程放开给马来人投标，华人公司要投标必须按市价卖出30%股份给政府隶属的子公司”（张姿慧2018: 163）。对一向承揽公共工程的吴家，无疑是增加竞争且要无条件牺牲股权，权衡后吴家维持祖业石山的开垦、缩减建设和工程规模，转向服务业。也因马来人在公部门成为多数，与马来人合作成为必要条件，如同一位金侨分享：“我希望马来人要有钱，你知道吗？他们只要有钱，这个社会就不会乱。因为马来人是一个最好的工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维持现状。我们华人才有机会赚…我们坦白说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能够站的那么稳？就是因为马来人的族群性…只要我们不走政治，与马来人很好相处”。当政府办公人员多是马来人的情况下，雇用马来人负责跑政府部门、打通关节，成为一种策略，此改变华企纯用华工的传统，产生不同层次和形式的中马连结（Gomez 2009；李健友2016），发挥支持性与补充性作用。在中国崛起后，华商/华企成为两国中间者，产业内中马联合促进产业升级、组织内中马的内部结构有利于公私部门联系，不同层次的跨族群连带整合到发展架构，是新经济政策所建构的发展路径？

（2）Wu2为中心的跨国家业，家庭成员持续的跨国离散

就Wu4的说法，Wu1在家族事业的角色是买地、买山，真正让家族事业发展与扩张的是Wu2。在1942年，Wu2在日本殖民政府委托，接下陈金声大桥案，声名大噪。1968年英国殖民政府在马六甲建兵营，吴家独家供应石材，可见其与政府有相当关系。后将“Wu2有限公司”改为“Wu2建

筑有限公司”，成立“吴家父子有限公司”，转向建筑业扩张，扩张事业的策略，与金门丰隆集团合作，是与妹婿、拜把弟兄联盟，准亲属化是将事业扩张的基础。马来西亚发展重工业时，Wu2发展砖厂和水泥预拌厂，继续买石山。1980年代转做建筑开发商，成为当地最大建筑开发商，随着政府推广沥青道路，Wu2成立水泥拌厂，将沥青出口到新加坡，家族事业迈向国际，包括在台北设有店面。简言之，一面紧跟政府产业发展的脚步、一面连结乡亲是吴家家事业发展的要诀。

此时劳动力的雇用扩大到马来人，面对政府公部门的要求，管理权仍以男性家庭成员为主，投资合伙和事业转让以乡亲为原则，展现华人家族企业基本模式（孔复礼2019：244）。Wu2在产业、教育界、同乡会等社群担任公益要职，并持续经济支持金门大地吴家家庙兴建，可见其在马六甲和金门均有相当影响力。

Wu2严守不得娶外国女子结婚的家规（张姿慧2018：170），在金门娶妻，后生5名子女，除长子外，其余皆出国留学，家族留一子照顾事业与家庭是延续金门传统，留根传宗接代（江柏炜2012）。至此，吴家后代继续跨国迁移，不再只是被迫出走，而是人力资本的投资做为家庭策略，以便返家精进家业，迁移目标国家以英、澳大利亚为主。国外学成后，Wu2的次子、三子返回马六甲发展各自事业，家企朝跨业发展，与长子共同参与祖业石山的治理。简言之，因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吴家子孙继续跨国离散，家业以马六甲为主，复制早期金门家庭向外迁移后以老家为中心的模式，而马六甲家业的重要性，不再只是光宗耀祖，更包含支持子代在他国生存、原乡金门的发展，马六甲吴家的地位更为重要。

（三）1990–2018年冷战后区域政治经济：国家经济战略与家企现代治理的连动

（1）中国崛起的文化与经济全球化：金门和马六甲进入中国发展蓝图

1990年冷战进入尾声，1992年金门解严，十年后小三通政策的实施，重启两岸互动，金门成为和平前线。至今，金门已成为国家与非国家之

地，是通往东南亚的要塞（白永瑞2016：104-108）。随中国崛起，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成为一种全球动员的文化标记，侨务成为外交政策的一环，均以华人儒家文化逻辑运作，支持中国经济全球化（Ong 1999）。如何成功“打侨牌”链接侨民和侨社组织，成为官方的重要任务。近年，金门县政府透过Line连系就有五十多个侨社（翁维智2018），透过全球串联，因应全球政治经济的机会与挑战。从2005年起举办“世界金门日”，透过联谊性全球大会，让世界各地金门人共叙乡情、共谋发展、牢记乡根、追求和平，达到“让世界了解金门，让金门走向世界”的目标，此以地缘纽带为基础的组织，经过百年来的蜕变，展现新的链接型态，共谋利益。为此，金门成为文化符号，动员侨乡时期与战争集体记忆，运用华人符号链接中国的发展脉动，海外金侨、中国与金门进入到新的互动时期。

近年，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提出“2020宏愿”，将伊斯兰价值观注入国家行政体系，在求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目标下，提出“向东政策”（Look East Policy），进行第二次进口替代，发展重工业政策，鼓励本土企业（如石化、木材、橡胶、棕油等），引进大量外资进入建筑、钢铁、电子电器等，近年更强调知识、科技和人力资本的建构，让马来西亚成为亚洲四小虎国家之列。为此，对国内企业要求现代治理，注入竞争机制，削弱独占地位，迫使家族企业管理走向现代化与透明化，以利与国家经济发展的整合（Goh 2008）。中国已是马来西亚的最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第一大外资，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与中国密不可分（辜树仁2018），运用华人企业产生国际间合作成为新的可能（Yue & Kean 2014），这些种种加强国家对华企的介入与要求。

马六甲位置也在这个时期另有契机。古城内的建筑、教堂、广场以及防御工事展现历史文化，蕴含多族群与多元文化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老街、老庙、老店、老文物被纳入观光与旅游计划，成为新重镇。马六甲海峡与港口原本就是世界第二忙碌的国际港口，是中国石油输入的必经之地，2013年中国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马六甲海峡被纳入一环，两国合作兴建皇京港，有利中国力量深入全球。

（2）响应政府压力与家庭歧异：家族主义逻辑成为解药

在Wu2于2001年离世前，已陆续将家业交给子孙。身为长子的Wu3，沿袭金门传统，独留在马六甲学习家业管理。1991年，Wu2找回在澳洲念书的长孙Wu4，进入家业、娶妻生子、重新认识金门传统与宗亲礼教。十年后，Wu2过世，家业由子、孙辈接手（子辈3人、孙辈3人）。有别于第一代交棒模式，因家族事业规模相当庞大、男性子嗣人数众多（同代Wu3男性子嗣3人，到第四代男性子嗣有8人），产生以男性子嗣为主的跨代接班团队，但无具体分工下，种下冲突的种子。Wu4回忆当时被叫回的经验：

第二代已将建筑业发展到顶峰，第三代接手时，我的父亲，从小跟着学石矿场与建筑，叔叔们帮忙，石场可以维持70-80年，我本来是在澳洲读书，被爷爷叫回来，我是大哥，也是长孙，就回来跟着学建筑与石矿场，两个弟弟就较可以自由发展，自己做甚么自己闯甚么都可以....我回来是因为从小跟祖父一起生活....

从Wu4的表达可见闽南家族继承以长子长孙为主，次子和女性的生涯较有多元化发展路径，身为长孙的他从小与祖父睡同一张床，关系紧密，从祖父口传金门故里的事，培养继承与接班所需的隐知识。1992年他从澳洲回马六甲，有十年跟着家族学习石场与建筑业的管理，并学习同代、跨代的人事治理。但因接班团队中第三代成员的冲突，严重到影响家业运作，成为他主要挑战：

从澳洲回来就开始在这边工作欸！我的父亲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他们兄弟间的问题，像他们兄弟吵了一年不说话。我们有过清明节，我就跟我父亲说，父亲啊！现在趁你跟叔叔在一起，你们一年没有讲话了，你们心过的了吗？既然阿公阿嬷今天都在，不如你掷个筊。你们要做这个生意嘛，对不对？交由大哥掷筊喔！父亲你掷筊问阿公阿嬷在吗？如果有圣筊，他们就有在，你就再问他，现在他要做这个可以吗？如果可以，就圣筊，如果不可以呢，就是笑筊。结果掷了以后，圣筊，这样你就要做了喔！

所以我处理第三代的这个冲突，必须要用他们的传统、观念，他们最崇拜的人就是父母，这个是你自己掷的，所以我就慢慢化解这些。

Wu3自小独守家业，兄弟吃过洋墨水，各有事业，手足信任相对薄弱。Wu4被组织在由上一代为主的接班团队，身为后辈的他实难化解。度过一年冷战期，利用慎终追远的清明节，运用掷筊民间传统，处理家业治理的危机。清明节在华人社会的意义胜于过年，强调饮水思源，在仪式中增强家庭传统与价值，达到家庭成员凝聚之效。掷筊是世俗之人面对未知与难以决定的事时，向神明求指引的方法，筊多用竹、木等材质做成，两个为一对，筊是立体的新月形状，每个称为一“支”，分有正反面，凸起部份称为“阴面”（也就是反面），平面的部份为“阳面”（也就是正面）。掷筊过程是掷筊者须先有恭敬态度，将所要问的事情默存于心默念，后丢出两支到地，如呈现一个平坦、一个圆弧，就是，还要继续，如果两个都面朝上，就是圣筊，表示所询问的事得到支持与同意，如两个面朝下便是所询问的事不被神明支持。

中国人诉诸百善孝为先的儒家伦理，父母死后列入祖宗牌位成为神明之列，透过掷筊与父母沟通化解冲突，打“父母牌”摆平第三代兄弟之争，奠定Wu4坐稳掌门人的地位。从几次接班的模式，归纳继承家业的重要步骤：1.继承者与前几代掌权人有强烈的个人连结；2.继承前有相当时间的学习历程做为过渡；3.先成立新公司作为独立经营经验；4.获得同代与跨代家庭成员的支持与认可。

化解接班团队的冲突后，第四代再进行某种程度的“分家”，将不动产进行重分配与活化利用，将各家家产出租，让各代各家有基本收入，并扛起自家的投资责任：

我就用十年努力，他们才答应把店面分给他们。我在这十年，我把房子租出去，所以他们只要继承了，他们有定期的租金，生活就不会辛苦。他们有租金，他们就很舒服的嘛。要不然整天就要跟公司拿钱吵吵闹闹的。他们如果要孩子投资做生意，就可以把

自己的房子押给银行去做啊！你成功也好！你失败，那个是你们的失败啊！比如有一些孩子不理、父亲也健忘，他的租客就慢慢跑了，就没有租金了，那个是他的事啊！因为已经分家给你啦！你才会训练他们要让子孙有责任啊！不能再找我啊！

华人家企多由一人独揽大权，造成家庭成员的利益冲突与过度依赖，Wu4透过家产的重组与再分配，达投资目的，兼顾家庭成员基本生活，降低家族成员的依赖。以前个人如需经济援助、生病与拜拜支出等，在人事不分下，伸手要钱即可。吴家一年拜拜高达三十余次，花费从不记账，财务不透明，是一种隐形成本与浪费。透过家业的资产盘点，资产出租，透过固定租金收入维持基本生活所需，拜拜的支出也以一间租金支付，财务管理走向透明化，降低家业家用不分的陋习，减少隐形成本、化解家庭冲突，达到各家自立自强的目的。Wu4私下说将房舍出租是面对政府抽高税、规定公司股东30%比例规定对策。

此外，在这个阶段，对家业中亏本生意，促使转型，让其转亏为盈：

我叔叔爱打壁球，他就做了壁球场，就荒了...也是个亏本生意嘛，荒了三十多年。我就问他说：“这个是你父亲给你做的，你不如给我一个机会，我去跟它改型成一个餐馆。”他说：“可以吗？”我说：“你给我一个机会，我也不知道可以不可以。但是现在你亏钱啊！你让我闯一闯，就算说我弄不给你亏，就是赚了。”我就把他租出去，结果这个餐馆已是马六甲数一数二少数民族的餐馆。

马六甲服务业的发展，带动餐馆、饭店，需要打破单一族群的合作模式，方能营造多元文化的服务产业。Wu4在机缘下认识一位印度厨师，空有好厨艺，但缺资本及房子，难有发展。他游说叔叔顺利将房舍租给印度厨师，每月收租金，创造三赢。在马六甲的印度人受新经济政策影响被边缘化更深，常落入贫穷人口。Wu4深知餐旅是服务业重要的一环，运用跨族群合作，看准印度的市场及观光业的商机，展现有别于老一辈侨领的经商手法。

从吴家第一代在马六甲建造洋楼经过百年洗礼，与其每年花修缮成本不如改建。Wu4经过努力取得家族同意将其改造为饭店，象征吴家家业走向服务业：

我把留下来的资产，我立为不动产，不能买卖，不能更新，我已经经过同意了，就是在五年内我要把这个地方做成一个饭店。目的就是把这个古厝留下来，弄好交给下一代去经营。下一代不只是我的小孩，还包括我的二叔的孙、我的三叔的孙、我的孙也好，只要没有工作，你想上班就在这边给你一份工，然后这一份工就可以给你一份稳定薪金，然后你自己也有一个股份，所赚的钱也给你。如果可以这样运作下去，我就可以永永远远保持这个家产与家业；用公司所赚的钱，扣取维修剩余的钱分给大家。

公私不分一直是家族企业管理的问题，Wu4重建新的游戏规则，让个别家庭成员有选择权决定是否在家业工作，进入家业者被视为员工，遵守公司管理。并引进透明化与专职管理机制，财务公开，会计聘用专业人士，公司走向制度化与程序化，去除家人不做事的陋习。管理与所有权走分离制，透过股权共享，让各家透过代表，各家委派一人参与股东，各自分享股份，降低人多口杂的内压。管理与执行权集中在Wu4，他作为掌门人只多拿一份薪资。治理的变革既符合政府规定及降低家庭内部冲突。从1980年起，二权分离成为马来西亚华人家族事业主要的治理模式，无疑是制度压力下的结果。

家业经营走向制度化、家产走向分租与活化、迈入饭店经营与管理，让Wu4成为家族中心，他说：“我跟我叔叔说，我不理谁对谁错，那个是你们第三代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要把你们的怨恨传到第四代，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第四代的可以跟我硬对硬，因为我太熟了。我希望你们第三代的有什么不开心的，就到此为止。你一定要有硬，你一定要有说服力，你才能维持整个家”，他透过孝道完成家业的“整合”，是华人注重饮水思源的文化资本，成为吴家家庭资本，以利事业体的重组，成就百年大业。在东南亚闽南家族，尽管生活方式逐渐入境随俗，内在思想并无

根本差异，反而更加强闽南文化重视宗族、祭典与族谱，成为家庭内调节和凝聚之道（苏黎明2018），颠覆中国“富”不过三代的咒语。

建立在家族地位、获得乡亲尊重的方法是衣锦还乡或透过侨汇促进家乡发展、改善宗祠与家庙、举办教育等（孔复礼2019：76）。在金门实施小三通政策后，吴家与原乡联系更为密切。自2006年起Wu4开始处理已有百年历史的金门古厝，在金门战地政务戒严时曾被军队进驻，后由亲戚代管，亲戚年迈无力照顾，在将所有权转移到海外吴家后，Wu4与地方政府合作进行古厝重建，顺利将金门古厝登录为文化资产，让后代子孙回到故乡能认识吴家历史，此将家庭文化资本的具象化并将历史变成故事、变为文化资产，是吴家善用在建筑业的优势重建代代相传所需的文物资产，成功地将家庭史连结到历史。

如今，培育第五代接班人是吴家现在重要的使命，Wu5为长子，目前24岁，同代手足的男性成员多未成年，2019年受父命从澳洲回马六甲，进入到家族事业：

因为在这边，就只有三个男孙，他是最大的，他现在24岁，另外一个12岁，另外一个才10岁。如果他不回来我怎么继承啊？我这条线就断了，所以牺牲一定要的，然后牺牲了他，我也要牺牲，我必须跟他创业，我必须辛苦，为了他，我必须花多几年把他弄好，确定他没有事，我们才可以离开。

依循吴家接班模式，Wu5与祖父从小一起生活，知道祖父如何辛苦经营家业，从国外返家，父亲为他开一个饭店，第五代从饭店设计、装潢、网络建构，都是独自经营。同时，安排他每年回金门故乡，一起处理古厝，参与金门文化局举办青年寻根之旅，学习金门人情世故，建立金门身分认同，是吴家接班人必经过程。

吴家从第三代便将子女与后代送出国念书，在另一国度发展，后代多是受高等教育的专业白领工作者，现在吴家约有60%的亲友住在澳洲，建构两轨生命历程轨道，一是发展自己生涯，寻依亲网络到国外发展，此以次子与女儿为主，一种是长子长孙的人生轨径，以马六甲家业为中心，如

Wu5所言：

我们去澳洲是我的阿祖他们赚了一笔钱，然后想把他们的孩子都带到澳洲去念书。在那里就有很多亲戚，差不多55%的亲戚都在澳洲。因为我公公他们有三个兄弟。一个在马来西亚，两个在澳洲。也是因为亲戚在那里，我才过去澳洲念书的。我们那也有买房子，省了租金喔。但不会想当永久成为澳洲居民啊，我是唯一的儿子，没人接手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如果我在澳洲自己闯，我也会觉得我会做的OK的，但是因为家里要我回来，我就没办法了，就必须回来。

长孙长子的生涯是特殊的，从小与祖父建立强连结，是承接家业的原动力，走上接班人的路，文化上意涵。Wu5回来前后，海外同侪及亲友纷纷问“为何回家接苦差事？”长子继承的传统让他难以说不，继承纽带将祖孙、长男、长子与长孙的跨代联盟代代复制，在不同历史阶段承担吴家百年发展的重责大任。

华人组织的研究强调的工作动机，是一种家的成就，以维系家道（郑伯勋1995）。但家族事业又是企业与家族系统的复合体，企业转型需考虑家族利益与身分，家族变动也要顾虑企业存续，往往在人、事纠葛与纷乱，引发危机，尤其是代际接班之时（杨光飞2010），是家企研究凸显的双元性与矛盾性。事实更为复杂，如包括家庭成员分散多国、各处，有不同生命历程和价值，涉及跨代可能有不同国籍和国族认同，可能影响家庭和谐和家业治理。

因为我们的生意有牵连到我们的所有的亲戚。我回来这里的时候，我爸爸大部分的工作有70%都是在处理家庭的事情，我爸是说让我家里的事情先别碰，让我先了解我们公司的本性。以后如果我看见什么不对劲，至少我学过，就也不会被骗。

Wu4知道家族是非与家业治理存在一定连结和矛盾，也唯有家庭掌门人能想出“家法”突破重围，将接班团队跨代冲突降到最低，以利第五代

上位。华人家庭强调“序”，包括跨代关系的界线，如何运用在家业治理，代代相传的是债、是荣誉，就是选择。因Wu5展现对家族事业付出与承诺，超过同世代男性成员，获得叔伯代认可，走进继承位置。

六、理论架构的雏型：马来西亚金侨吴家 百年征途的多层次分析

金侨吴家在马来西亚的家庭生命历程，经历五代，涵盖金门、马来西亚、东亚史，经冷战在东亚蔓延到结束，贯穿金门与马六甲百年变迁。吴家聚散受超国家的政治经济力形塑，家业成长、发展与转型镶嵌于马来西亚拚经济的发展架构，连结微视和巨视的多层次分析架构如图2。

（一）历史时期与制度变迁：家庭变迁与家业转型的结构条件

金门男性为求家庭生存，经厦门下南洋，背后存在列强殖民产生大量劳动力的背景。因原乡金门受日本殖民，是家庭被迫迁移的根源，后金门被卷入冷战，实施多年戒严，吴家不得不在马六甲“在地生根”，家庭迁移是跨国政治经济的产物。2002年金门成为两岸交流的实验县，致力于观光与服务产业，与中国发展多边深度的交流，重建全球金门人连结，连动中马两国的合作关系，金门百年变迁形塑有家归不得、他乡变故乡、原乡还是原乡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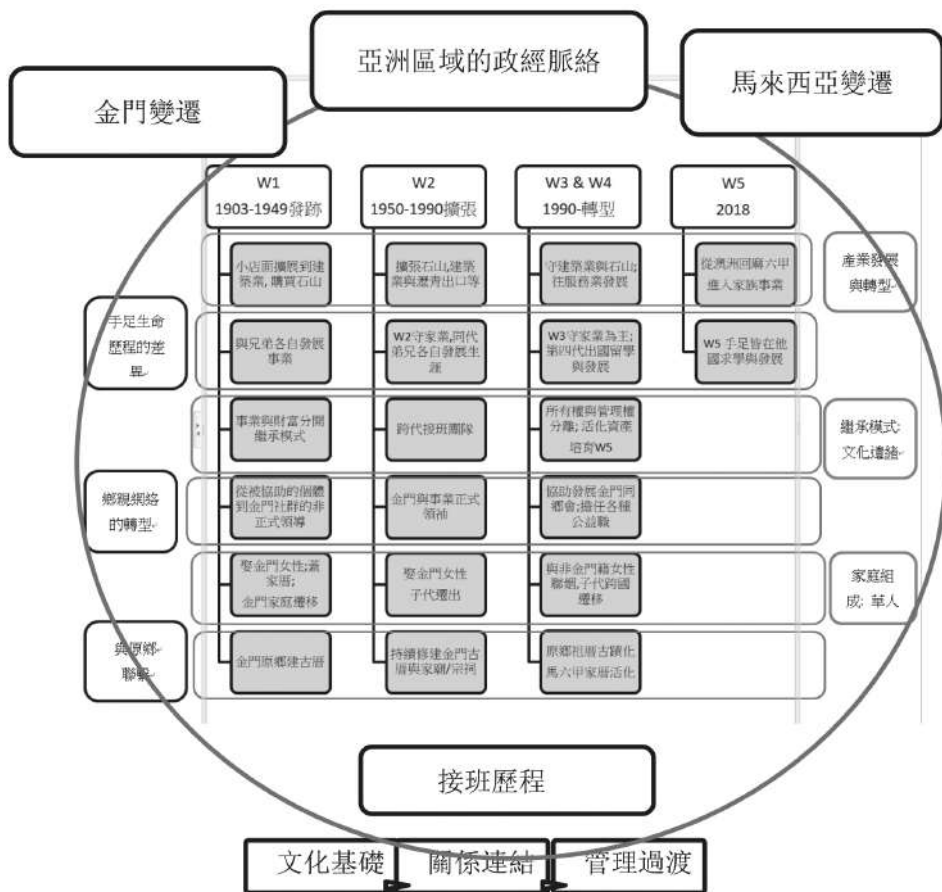


图2: 吴家在马来西亚的百年征途: 一个家族、五个世代

马来西亚在英国殖民时期需要大量劳动力, 成为福建金门人前往的目标, 为保障当地土著和马来人利益,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已建立族群政治, 到独立建国后, 513事件让华人生存更为艰难, 1970年新经济政策直接保障马来人利益, 促使华人出走, 吴家后代因此继续跨国离散, 复制金门出洋模式, 形塑两轨家庭发展路径, 影响家庭凝聚和关系。中国崛起, 中华文化成为华裔子孙必修课, 回到祖国老家成为学习文化的途径, 连动金门、中国和马六甲的特定关系, 跨国离散的家庭有新的连结目的和样态。

吴家在马六甲家业经历多重转变，第一代从苦力做起，开店尝试进入马六甲发展所需矿业与建筑业，自成吴家一条龙的生产体系，拿下重大工程，跨国发展，当马六甲发展古城拚观光与服务业，吴家顺势转型，显见家族事业的演进与马来西亚产业转型有高度密切链接，结构脉络是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架构背，华人企业成为转型目标，无论是在产业板块移动或是企业内部治理，均在竞争与政府规定下权变响应。

（二）中介层次的影响机制：华人网络与家族网络的作用

侨乡时期建构连锁性移民管道，是吴家第一代落番的中介条件，兄弟在码头当搬运工，住在苦力间，其是单身、男性移工的栖身之所，更是劳动力中介所在，连结马六甲产业市场。此后，吴家发展事业，以雇用乡亲为主要劳动力，自成吴家一条龙的生产体制，降低成本，发挥团结作用。Wu1从被协助之个体，转为提供工作机会的雇主和与政府、产业界谈判的领袖，让吴家活动范围从私领域走到公领域，在黑白两道备受尊崇。

中国崛起，中华文化与儒家价值支撑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全球性华人组织网络进行链接与互动，展现国族、文化与经济活动的整合。中马两国的合作，提供华企新契机，金门与中国相邻，带动海内外金门群体的优势，“世界金门日”的举办便是种文化再生产的活动，重塑全球金门意识与认同，吴家在此浪潮下回金门寻根，显见重建金门意识与身分有利连结中国全球化产生的机会，展现族群网络本质、结构与功能的变迁。

家族网络如何响应国家政经体制的压力。在殖民时期，吴家维持金门传统，男性返金结婚生子，维持跨国家庭运作。举家迁移马来西亚后，依循男女有别和男性宗亲为主的家族体制，女性成为稳定家业的再生产体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后，族群政体压缩华人发展空间，引发华人出走潮，吴家后代继续跨国迁移，多数在澳洲定居，使家庭生命历程愈来愈多元，走向两轨。吴家既有闽南家族移动的本质，展现多元化家庭生命历程，马六甲的家庭成为新中心，循文化脚本形塑特定连结，支持家庭成员在全球发展。

（三）微视层次的影响机制：特定文化逻辑在家族企业治理的角色

从吴家案例可见管理与继承既受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形塑，也存在文化逻辑。第一代交棒，将事业与财富分开继承，维持一人独揽经营权，第二代交棒给接班团队，产生同代冲突，透过家族伦理化解危机，最后将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引进专职管理人员和技术，化解家庭分散和世代人口众多的复杂，更响应政府引进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外在压力。

无可否认，吴家交棒仍存在偏私化与封闭性的继承模式（杨光飞 2010）。维持内外界线，内部是男性参与和继承的文化脚本，排除女性，再透过向外移民，降低非长子长孙参与可能，促使权力集中、减少交棒复杂，走向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文化脚本与现代管理整合的结果。华人文化和家族伦理在不同时期扮演凝聚、整合和发展的主要功能，前两代生于金门，受金门传统熏陶，成立吴家品牌的公司，第三代、第四代因接班团队内部冲突，家族伦理成为家族与家企整合的工具，而华人文化和家族伦理成为族裔企业的标示，有助于中国文化全球化发展架构，此时华人文化与家族伦理有促进发展的功能。

谁是接班人？谁有接班资格？如何顺利接班？是分是合？是家庭永续和家业发展的核心。具体接班轨径，吴家自成一套法则：1.文化基础：继承者要对原乡文化与金门身分的认同；2.跨代依附：接班人与祖父关系具强烈的依附；3.管理的过渡与转衔：子代进入传统家业，从第一线做起与经验，作为转衔阶段。上一代成立小公司，让子代独立经营；4.跨代同代支持：接班者能否坐大位，取得同代、跨代支持，诉诸“只要有一人参与管理，其他坐享其成”的策略，将参与管理建构为苦差事，展现对家族的效忠与牺牲，是接棒要素。

简言之，金门吴家在马六甲百年的征途，是家族掌握特定历史阶段下的机会，运用资源与策略面对结构性压力的过程。吴家家庭结构的分合、聚散、生育结婚、教育与生涯，受超国家的力量影响。家庭生命历程循着男女有别、继承传统发展出二元轨径，现代治理技术的引进不过是化解家庭冲突和达到政府要求的策略，光宗耀祖、饮水思源的家族价值才是助于

吴家家企走过过去百年、迈向未来百年的关键，尤其是华人文化与家族伦理在马来西亚不同时期扮演凝聚、整合和发展的作用。

七、讨论与建议

本文从家庭生命历程观点，立基质性研究典范，运用单一个案研究设计，探索金门吴家在马来西亚百年奋斗历程，透过多层次分析发展家庭变迁、家企治理连结特定历史阶段的架构。主要发现有四：一、吴家家庭变迁与家业转变，受超国家、国家力量形塑，也是家庭权变的选择，家庭在特定时期呈现分离、团聚、持续分离与新的联系样态。二、马来西亚特定殖民体制和族群政治经济体制，提供华企特定的机会与压力，吴家以家庭永续、繁荣为前提，保留祖业，家业转型取决特定时期的结构性机会与压力，展现特定伦理次序。三、儒家价值与家族伦理在家庭变迁与家业治理的角色，需放在全球化脉络，在不同时期扮演凝聚、整合和发展的功能。前两代严守金门宗族与价值传统，社群以忠义诚信为本，有利华企发展与壮大。自第三代起家庭分散，孝道成为化解危机的秘方。中国崛起后，儒家思想与家族主义的全球化是海外华人的文化标示，有助于进入中国全球化的文化与经济体制。四、马来西亚族群政治经济体制下，建构不同层次的马华连带，如何整合到中马两国的合作层次，值得长期观察。

华人文化与家族伦理既是家企内部矛盾的因，也是解药。传统家企研究聚焦内部的双元性，多从西方管理学视角，忽略华人文化看家庭、解决之道并非仅在管理层次，而中华文化和家族伦理在特定条件下如何有利于家企治理和家庭整合？此外，新经济政策以降建构马华连结如何因应中马多边关系的发展，新的族群关系的内涵与要素需要进入理论层次思考。本文主要限制是缺少产业特性的治理分析。华企研究如何在族裔企业研究绽放光采，更深建构中华文化如何在百年家族企业扮演的角色与作用，透过其他族裔百年的家企研究（如日本海外百年家企、印度海外百年家企）的比较研究，突显文化在家庭企业治理的关键作用，助于理论的精进。

注释

- 1 在White & Klein (2002) 初版*Family Theories*中第五章〈The Family Life Course Developmental Framework〉是以一个理论架构定位 (theoretical framework), 表达每科学领域存在特定理论假定与命题, 透过概括性的架构增加概念应用 (White & Klein 2008: 30; 马永年、梁婉华译2016: 30), 马永年、梁婉华译 (2016) 将其翻译为“家庭生命历程发展理论架构”。但发展一词具有价值意涵, 本文以“家庭生命历程理论”称之。
- 2 家庭发展理论认为家庭变化如有机体, 主张家庭循着固定、可解释阶段迈进, 有相似阶段与过程 (Melo & Alarcão 2014)。生命历程理论自1990年被重视后, 强调动态、去阶段化的历程, 舍弃家庭发展理论存在周期性、生物性本质论 (McCarthy & Edwards 2011), 将家庭发展视为家庭变迁的一个形式与一个可能 (马永年、梁婉华译2016: 131)。个人生命全程理论视个人发展是多方面、一生的过程 (Smith-Osborne 2007), 强调规范性发展, 以个体间发展之比较和个体不同阶段发展的比较掌握变化, 助于家庭生命历程理论重视长期性的研究。
- 3 90年代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四国经济起飞快速, 马来西亚是亚洲四小虎中, 人均GDP最高的国家。<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9768>; <https://daydaynews.cc/zh-tw/international/254721.html>
- 4 <https://www.trademag.org.tw/page/newsid1/?id=772763&iz=1>

参考文献

- 方伟晶、陆超明2011。〈华人族裔企业与全球化〉。载《华人族裔企业：英、加、澳华人企业最新动态调查》。方伟晶、陆超明编。台北：群学，页1-22。
- 王国璋1997。《马来西亚的族群政党政治（1955-1995）》。台北：唐山。
- 王宏仁2001。〈家族或是企业？社会价值与市场原理的矛盾冲突〉。载《台湾的企业：组织结构与国际竞争力》。张维安编。台北：联经，页297-312。
- 石沧金2013。《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孔复礼2019。《华人在他乡》。台北：台湾商务印书局。
- 白永瑞2016。《横观东亚：从核心现场重思东亚历史》。台北：联经。
- 江柏炜2003。〈金门洋楼：一个近代闽南侨乡文化变迁的案例分析〉。《国立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学报》20: 1-24。
- 江柏炜2013。〈晚清时期的华侨家族及其侨资聚落：福建金门山后王氏中堡之案例研究〉。《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15(1): 1-57。
- 江柏炜2016a。〈近代菲律宾金门移民社群及其文化变迁：以乡团及家族为主〉。《海洋文化学刊》19: 67-116。
- 江柏炜2016b。〈海外华人社会文化的田野调查经验：以金门社群为例〉。《人文与

- 社会科学简讯》17: 102-109。
- 江柏炜2019。〈海外金门人的迁徙经验：以文莱烈屿家族为主的考察〉。《国史馆馆刊》61: 117-119, 121-174。
- 古鸿廷1994。《东南亚华侨的认同问题（马来西亚篇）》。台北：联经。
- 李新春、檀宏斌2010。〈家族企业内部两权分离：路径与治理〉。《中山大学学报》50(4): 178-188。
- 李业霖2001。〈陆佑：悠悠百世功，矻矻当辛苦〉。载《创业与护根：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儒商篇）》。林水椽主编。台北：中央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页109-139。
- 李健友2016。〈家族企业的隐形知识创新、企业发展和世代交替：马来西亚华人塑料制造业的纵向个案研究〉。《商略学报》8(4): 211-250。
- 宋郁玲2002。〈人文地理学人口迁移研究的跨界与转向：台湾与英美研究的比较〉。《地理学报》43: 31-79。
- 宋丽红、李新春、张书军2012。〈从家族企业到企业家族：基于分家的多案例研究〉。《管理学报》9(6): 800-808。
- 宋怡明2016。《前线岛屿：冷战下的金门》。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 伊庆春、吕玉琨1996。〈台湾社会学研究中家庭和妇女研究之评介〉。载《两岸三地社会学的发展与交流》。萧新煌、章英华编。台北：台湾社会学社，页169-192。
- 吴燕和1985。〈中国宗族的发展与其仪式兴衰的条件〉。《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59: 131-142。
- 吴伊凡、蓝佩嘉2012。〈去中国留学：旅中台生的制度框架与迁移轨迹〉。《台湾社会学刊》50: 1-56。
- 吴元珍译。《血汗与麻将：一个海外华人小区的家庭与企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林若云2001。《马哈迪主政下的马来西亚：国家与社会关系（1981-2001）》。新北市：韦伯文化。
- 林金荣2009。《金门传统聚落形成发展族谱资料汇编》。金门县：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
- 林水椽2001。〈功垂竹帛：马来西亚的华裔儒商〉。载《创业与护根：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儒商篇）》。林水椽主编。台北：中央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页x-xxxviii。
- 洪嘉瑜、银庆贞2008。〈台湾人口迁移属性与动机的变化〉。《东吴经济商学学报》61: 31-66。
- 胡其瑜2018。〈16世纪以来欧洲华侨华人口构成概览〉。载《移动之民：海外华人研究的新视野》。张琼惠、梁一萍主编。台北：台湾师大出版社，页39-56。
- 翁维智2018。〈金侨服务平台 县府昨召开侨务工作会报〉。《金门日报》2018年4月9日。Retrieved on 8 Dec 2020 from <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2/292912/h>.

- 马永年、梁婉华译2016。《家庭理论（3版）》。台北：五南。
- 辜树仁2018。〈马来西亚为什么离「高收入国家」愈来愈近？〉。《天下杂志》。网址：cw.com.tw（取用日期2020年12月1日）。
- 章英华1994。〈台湾的家庭研究：从家户组成到家人关系〉。《小区发展季刊》68: 35-40。
- 黄佳媛、姜兰红、陈端容2012。〈亚太地区国际与国内迁移关联性研究〉。《人口学刊》44: 171-182。
- 黄子娟编2017。《冷战金门：世界史与地域史的交织》。金门县：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
- 雷洁琼2000。〈家庭社会学二十年〉。《社会学研究》6: 1-4。
- 欧阳仪雄2019。〈浅谈未受日本殖民的金门政治主流意识〉。《金门日报》2019年2月12日，言论广场。Retrieved on 8 Feb 2020 from <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6/302903/>。
- 张姿慧2018。《吴心泉家族史》。金门县：金门县文化局。
- 张琼慧、梁一萍2018。〈海外华人研究社群之过去、现在与未来〉。载《移动之民：海外华人研究的新视野》。张琼慧、梁一萍编。台北：台湾师大出版中心，页9-16。
- 曾熾芬2012。〈台湾人迁移中国：变动中的旅程〉。《当代中国研究通讯》18: 2-4。
- 陈琮渊2015。〈再探马来西亚华人属性的形塑：全球化、民主化与中国崛起〉。《淡江史学》27: 103-118。
- 陈立圆2020。《马来西亚雪兰莪金门会馆的社会功能及其变迁》。台北：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学位论文。
- 汤锦台2013。《闽南海上帝国：闽南人与南海文明的兴起》。台北：大雁出版基地。
- 杨光飞2010。〈财富分化、子承父权与华人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社会科学》7: 27-35。
- 杨利静、刘一龙2002。〈台湾的家庭生活历程〉。《台湾社会学刊》27: 77-105。
- 经济部/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经济组2020。马来西亚马六甲州将开发新经济走廊特区以吸引更多国内外厂商进驻。Retrieved on 20 June 2021 from <https://www.trademag.org.tw/page/newsid1/?id=772763&iz=1>
- 蔡继光译2002。《国际迁徙与移民：解读离国出走》。台北：书林。
- 苏黎明2018。〈南洋群岛的闽南家族文化〉。《泉州师范学院学报》36(3): 17-21。
- 苏淑娟2018。〈大陈人在台湾的社会文化调适与认同之研究〉。载《移动之民：海外华人研究的新视野》。张琼慧、梁一萍合编。台北：台湾师大出版社，页357-394。
- 郑伯勋1995。〈差序格局与华人组织行为〉。《本土心理学研究》3: 142-219。
- 刘香兰2019a。〈掌握变迁中的家庭：家庭生命历程发展理论与研究反思〉。《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刊》23: 91-130。

- 刘香兰2019b。〈从前线到边缘的转折：金门的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台湾社会福利学刊》15(1): 1-89。
- 刘政宽2020。《马六甲华人历史街区的空间构成》。台南市：台湾成功大学建筑研究所硕士论文。
- 顾长永2006。〈台湾移民东南亚现象与经济关系〉。《台湾东南亚学刊》3(2): 105-125。
- 萧新煌、张翰壁、张维安编2020。《东南亚客家社团组织的网络》。台北：远流。
- 储小平2004。〈华人家族企业的界定〉。《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 49-53。
- 戴万平、顾长永2001。〈经济发展、民主化与族群政治：马来西亚的个案〉。《问题与研究》40(6): 69-84。
- 颜清湟1991。《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 BAXTER, Pamela and SUSAN Jack 2008. Qualitative case study methodology: Study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for novice researcher. *The Qualitative Report*, 13(4): 544-556.
- BENGTON, Vern L and KATHERINE R. Allen 1993. The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Applied to Families over Time. In *Sourcebook of Family Theories and Methods: A Contextual Approach*, edited by Boss, Pauline G., William J. Doherty, Ralph LaRossa et al. New York: Plenum Press, pp. 469-504.
- BOYD, Monica 1989. Family and personal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new agendas.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3(3): 638-670.
- BOYLE, Paul and ZHIQANG Feng 2009. A New Look at Family Migration and Women's Employment Status. Retrieved on 16 March 2020 from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111/j.1741-3737.2009.00608.x>
- BRUTON, Garry D., DAVID Ahlstrom and JOHNNY C. C. Wan 2003. Turnaround in East Asian firms: Evidence from ethnic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4(6): 519-540.
- DHILLON, Karminder Singh 2015.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Malaysia*, edited by Meredith L. Weiss. New York: Routledge, pp. 379-402.
- Elder, Glen H., Jr. and Linda K. George 2016. Age, cohorts, and the life course. In *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 edited by M.J. Shanahan, J.T. Mortimer and M.K. Johnson.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pp. 59-85.
- FELKER, Greg 2013. Malaysia'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Governing distribution-through-growth.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Malaysia*, edited by Meredith L. Weiss. New York: Routledge, pp. 133-147.
- FINDLAY, Allan, DAVID McCollum, RORY Coulter and VERNON Gayle 2015. New nobilities across the life course: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demographically-linked drivers of migration.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1(4): 390-402.

- FLETCHER, Denise Alfredo, De Massisb and Mattias Nordqviste 2015.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s and family business scholarship: A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Family Business Strategy*, 7(1): 8-25.
- FREEDMAN, Maurice 1966.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London: Athlone Press.
- GOH, Kian Seng 2008. *Corporate government practices of Malaysian Chinese family owned business*. Unpublished M. Phil. Thesis. Southern Cross University.
- GOMEZ, Edmund Terence 2009. The Rise and Fall of Capital: Corporate Malaysi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39(3): 345-381.
- GOMEZ, Edmund Terence 2013. Nurturing Bumiputra capital: SEM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In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in Malaysia: Affirmative action, ethnic inequalities and social justice*, edited by Edmund Terence Gomez and John Saravanamttu. Singapore: NUS Press, pp. 87-117.
- GOMEZ, Edmund Terence and SARAVANNAAUTTU, Johan (Eds) 2013.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in Malaysia: Affirmative action, ethnic inequalities and social justice. Singapore: NUS Press.
- GUAN, Yeoh Seng 2013.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Urbanisation and urbanism in Malaysia.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Malaysia*, edited by Meredith L. Weiss. New York: Routledge, pp. 249-260.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2020.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20*. Swizerland: IOM.
- KOFMAN, Eleonore 2004. Gendered global migrations: Diversity and stratification.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6(4): 643-665.
- LEE, Hwok-Aun 2013. Affirmative action in occupational representation: Policies and outcomes. In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in Malaysia: Affirmative Action, Ethnic Inequalities and Social Justice*, edited by Edmund Terence Gomez and John Saravanamttu. Singapore: NUS Press, pp. 205-235.
- LEE, Hwok-Aun 2015. Affirmative action: Hefty measures, mixed outcomes, muddled thinking.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Malaysia*, edited by Meredith L. Weiss. New York: Routledge, pp. 169-176.
- LIN, Ping 2013. Taiwanese women in China: Integration and mobility in gendered enclaves. *China Information*, 27(1): 107-123.
- LOPEZ, Carolina 2013. Interfaith relations in Malaysia: Moving beyond Muslims versus 'others'.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Malaysia*, edited by Meredith L. Weiss. New York: Routledge, pp. 324-325.
- MCCARTHY, Jane Ribbens and Rosalind Edwards 2011. *Key Concepts in Family Studies*. London: SAGE.

- MELO, Ana Teixeira de and MADSLÉNA Alarcão 2014. Beyond the Family Life Cycle: Understanding Family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rough Complexity Theories. *Family Science*, 5(1): 52-59.
- MILES, Matthew B., A., MICHAEL Huberman and JOHNNY Saldaña 1994.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n expanded sourcebook* (2nd ed.). Thousand Oaks: Sage.
-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alaysia 2018. "Malaysian Aerospace Industry Report 2016/2017. Retrieved on 16 June 2021 from http://www.miti.gov.my/miti/resources/NAICO/MITI_Aerospace_Industry_Report_2016-2017.pdf.
- NAUCK, Bernhard and SETTLES, Barbara H. 2001. Immigrant and Ethnic Minority families: An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32(4): 461-463.
- NIVALAINEN, Satu 2004. Determinants of family migration: Short moves vs. long move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7(1): 157-175.
- ONG, Aihwa 1999.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PATTON, Michael Quinn 1990.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SAGE publications.
- PRATT, Michael W. and BARBARA H. Fiese 2004. Families, Stories, and the Life Course: An Ecological Context. In *Family Stories and the Life Course: Across Time and Generation*, edited by Michael W. Pratt & Barbara H. Fiese.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p. 1-24.
- RAHURAM, Parvati 2004. The Difference That Skills Make: Gender, Family Migration Strategies and Regulated Labour Market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0(2): 303-321.
- SMITH-Osborne, Alexa 2007. Life Span and Resiliency Theory: A Critical Review. *Advances in Social Work*, (1): 152-168.
- STAKE, Robert E. 1995. *The Art of Case Study Research*. Thousand Oak, CA: Sage.
- TAN, Wee-Liang and SIEW Tong Fock 2001. Coping with growth transition: The case of Chinese family businesses in Singapore. *Family Business review*, 14(2): 123-139.
- TASI Ming-Chang and & CHANG Chin-fen 2010. China-Bound for Jobs? The influences of social connections and ethnic politics in Taiwan. *The China Quarterly*, 203: 635-655.
- TYSON, Katherine B 1992. A new approach to relevant scientific research for practitioners: The heuristic paradigm. *Social Work*, 37, 541-556.
- UMUT Erel, KARIM Murji and ZAKI Nahaboo 2016. Understanding the contemporary race-migration nexu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9, (8): 1339-1360.
- WHITE David M. and JAMES M. White 2002. *Family Theory* (2 edi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 WHITE David M. and JAMES M. White 2008. *Family Theory* (3 edi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WILLIAM A. V. and SUZANNE Davies Withers 2007. Family migration and mobility sequ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patial mobil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life course. *Demographic Research*, 17: 591-622.
- Williams, Fiona, JENNIE Popay and ANN Oakley 1999. *Welfare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s*. London: UCL Press.
- YIN, Robert K. 2003.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3r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YUE, Ma and KEAN, Yam Kah 2014. The changing and development of Malaysian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management model in a New era: A case study on Ann Joo resources berhad.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Culture*, 2(1): 138-155.
- ZIN, Ragayah Haji Mat 2013.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and poverty at the eradication in Malaysia. In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in Malaysia: Affirmative Action, Ethnic Inequalities and Social Justice*, edited by Edmund Terence Gomez and John Saravanamttu. Singapore: NUS Press, pp. 31-60.